

## 胡適與《自由中國》的互動

任育德

### 摘要

國民、共產兩黨對立，至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臺灣海峽政權分立實為20世紀中國重大變局。本文想探討知名自由主義者胡適對此局勢的觀感與如何因應及陳述政治信念，透過胡適與臺灣提倡自由主義刊物《自由中國》的互動進行觀察與討論。

胡適自1946年起擔任學術行政職——北京大學校長，個人支持和平的政治改革，無意主動號召並組織團體以從事自由主義言論宣傳。直到1949年初，胡適才倡議創辦刊物宣揚自由主義，隨即赴美。因為雷震堅持，使胡適成為臺北發刊之《自由中國》初期的發行人。雖然胡適於1953年辭去發行人職，仍為該刊顧問，以其聲名庇護刊物持續出刊，並調解執政者與刊物的言論紛爭。本文透過耙梳系列事件顯示，胡適一直關切於《自由中國》及臺灣言論自由進展，不因辭去發行人，亦或返國擔任最高學術行政主管——中央研究院院長後而有所降低或減弱。胡適與《自由中國》實際主持人雷震、刊物重要作者之一的殷海光在如何與執政者互動及關注焦點的差異，一併影響彼此對於如何在臺灣實現言論自由論點之差異。

關鍵字：胡適、胡適朋友圈、雷震、自由中國

## Interactions between Hu Shih and Writers for the *Freedom China* Magazine

Yu-te Jen<sup>\*</sup>

### Abstract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interactions between some historical figures — Hu Shih and writers for the *Freedom China* Magazine from the period of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conflict in Mainland China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 rival political regimes divided by the Taiwan Strait. As chancellor of Peking University, Hu Shih supported peaceful political reforms, but was disinterested in organized forms of preaching liberalism to the public in China. But at beginning in 1949, Hu ha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found some publications for promoting liberalism, and soon he was advised to go abroad to the U.S.A. Insisted by Lei-chen, Hu became the publisher of *Freedom China* Magazine issued in Taipei, though he was not in charge of its practical management. Because Hu was one of the famous and important figures in China, his great fame could be used as a kind of protective shield to the magazine for its criticisms of political affairs. After his insistence, Hu Shih resigned the nominal role of the publisher of magazine in 1953, though kept his eye on the issues of the magazine and freedom of speech in Taiwan as b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role of adviser and mediator in order to do his best to keep the magazine in running order. As President of the Academia Sinica since 1958, he was the supreme academic leader in Taiwan, and his concern for the magazine did not reduce or weaken, until its unprepared shutdown in 1960. Different relations with political rulers between Hu Shih on the one hand and Lei Chen and Yin Hai-kuang,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for the magazine on the other, not only affected their respective concerns,

---

<sup>\*</sup> Ph.D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but also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the subsequent fulfillment of liberalism and freedom of speech in Taiwan.

**Keywords: Hu shih, intimate friends of Hu shih, Lei chen, Freedom China magazine**



# 胡適與《自由中國》的互動\*

任育德\*\*

## 壹、前言

1952年底，胡適在《自由中國》三週年紀念會致詞表示：「《自由中國》雜誌各位同人盡了很大的努力，至少替自由中國（廣義的說，即我們的國家）建立了一個自由言論的機關。我們那時是希望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自由民主的社會。而自由民主的國家，最要緊的就是言論自由。」胡適期盼解除他因為歷史因素所擔任刊物「不負責任的發行人」虛名。「我希望將來多作點文章，作編輯人中的一個。」雖不擔任發行人，仍希望和社中同人一起站在自由世界的一方努力。<sup>1</sup>處在國民、共產政權對立的世局，胡適在臺灣與《自由中國》成員首度正式見面的場合如是界定雙方關係，看似單純，其中發展卻複雜許多，一併呈現臺灣自由主義發展與傳承的面貌。研究者因此產生好奇與追索其中原委，亦屬自然之事。

前人研究論著探討胡適與《自由中國》關係時，參用素材以雷震、胡適個人日記為主，旁及《自由中國》文章及時人零星回憶為主。<sup>2</sup>在單篇論文中，以陳

---

\* 本文完成，感謝陳宏正先生的鼓勵，與三位匿名審查人提出之審查建議，予筆者整理與省思空間。思緒不周之處自是筆者資質駑頓所致，尚祈方家識者多所諒警。

收稿日期：2012年7月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年1月29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sup>1</sup> 胡適，〈《自由中國》雜誌三週年紀念會上致詞〉，《自由中國》，第7卷第12期（1952年12月16日），頁4-5。

<sup>2</sup> 胡明，《胡適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白吉庵，《胡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上海：上海文藝出

儀深關注並掌握到臺灣自由主義發展脈動；何卓恩針對胡適在《自由中國》言論探析其思想角色；潘光哲論及《自由中國》對「民主經驗」的想像，均屬近年值得注目者。<sup>3</sup> 上述論著及論文中，何卓恩專文、楊金榮專書於探究胡適與《自由中國》諸人關係時，得出與前人不同之觀點，這使得重新檢視胡適與《自由中國》諸人互動便有其必要。特別是在近年更多史料（含雷震、胡適之間書信檔、傅正日記有關《自由中國》編輯部分者）逐步出現，給予研究者更細緻地檢討前人立論之餘，一併釐清相關人際關係脈絡、言行背景之可能，這也是促使本文得以就此議題進行寫作與檢討，較前人更能注意人際關係面（包括政權統治者）對於胡適與《自由中國》經營與編輯主力言語與行動所造成的影響。本文論及胡適朋友群，以在臺灣、與胡適有交誼、具有相近政治改良理念、有所聯絡者為主。其中毛子水、傅斯年、王世杰、梁實秋與胡適交情長久；《自由中國》經營與編輯主力雷震、夏道平、殷海光、傅正則屬1949年後才有所接觸者。<sup>4</sup>

本文既欲探討胡適與《自由中國》人士互動，即以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為起始，簡述其以個人及在野身分陳述之自由主義，及其支持和平改革之行動。其次探討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居於劣勢，迫使胡適基於反共前提，號召海內外

---

版社，1997年）；楊金榮，《角色與命運：晚年胡適的自由主義困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一九五〇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年）；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9年）；何卓恩，《《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威權體制下的民主考驗》（臺北：水牛出版社，2008年）。

<sup>3</sup> 陳儀深，〈一九五〇年代的胡適與蔣介石〉，《思與言》，第47卷第2期（2009年6月），頁187-216；何卓恩，〈思想與角色：胡適在《自由中國》的言論解讀〉，《安徽史學》，2009年第5期（2009年9月），頁63-71；潘光哲，〈形塑「黨國體制」與「民主經驗」的記憶文化〉，收入臺灣教授協會編，《中華民國流亡臺灣60年暨戰後臺灣國際處境》（臺北：前衛出版社，2010年），頁601-660。

<sup>4</sup> 何卓恩將雷震、夏道平、殷海光、傅正等人歸屬到臺灣走上自由主義思想者。沈衛威提及，毛子水、羅家倫、傅斯年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結交，王世杰是1920年代參與《現代評論》結交，梁實秋為《新月》雜誌時期結交。1940年代末期，自由知識分子重新組合，胡適、蕭公權、張佛泉、毛子水、蔣廷黻、杭立武、傅斯年接近國民黨方。章清則指出參政及成為政界人物座上賓與否影響胡與傅發言方式。何卓恩，《《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威權體制下的民主考驗》，頁147-153；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頁61-64；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359-364。

支持反共之知識人士集結。胡適寓居美國，仍因為雷震的堅持，成為臺灣宣揚自由主義的刊物——《自由中國》之「名實不符」的發行人。那麼，胡適和刊物之互動又如何？再次，當統治者權威日漸鞏固且不受權力制衡，與《自由中國》產生摩擦時，胡適又將如何因應？與刊物之間的互動是否轉變？胡適與刊物諸人的言論與行動路線產生差異理由為何？本文針對上述問題，以1953年前後胡適辭去發行人、1953-1958年返國定居前後作為時段觀察指標，根據相關史料進行分析探討，以期得出貼近歷史情境的成果。

## 貳、北大校長胡適（1946.7-1948.12）

胡適參與運作之政論刊物開支仰賴個人捐獻部分所得，具備同人活動性質，胡適從籌備到結束參與其中，並在教學與行政工作外，主動撰文議論時事。1946年7月，前駐美大使胡適由美返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至1948年12月中離開北平。此時正值國、共兩黨在政治與軍事關係上由和緩到全面對立。胡適此時已是知識界意見領袖——北京大學校長，與政界、學界均有一定溝通管道；<sup>5</sup> 胡適變成「公共人」，私人時間幾乎完全被剝奪。<sup>6</sup> 學者也指出他留存北大的檔案中收到各方各類來信，身兼中研院評議員、中基會董事等職；在校務工作上，要籌措經費、應付學潮、處理新建院系的教學，工作繁重。<sup>7</sup> 因此，胡適要為定期刊物撰稿是分身乏術。加以胡適日後坦承辦刊物意願不強：受限物價高漲、文人賣文、排字工資高漲，辦不了一份「獨立」的刊物。<sup>8</sup> 因此著重於北大校長之校務行政角色。

當時的學校如同社會的縮影，一樣成為國、共兩黨勢力競爭領域，校園學潮與政經環境動盪息息相關。針對學生運動的先行研究指出：國民黨嘗試使學生活動「非政治化」的努力未告成功。學生在1948年初仍希望和平及國、共分享政治

---

<sup>5</sup> 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頁326。

<sup>6</sup>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頁92-93。

<sup>7</sup> 歐陽哲生，〈胡適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1997年5月），頁53。

<sup>8</sup>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44。

權力；但到1948年下半年，因經濟情勢不佳、國民黨以軍警壓制學生示威遊行，引發學生反感。共產黨運用統一戰線聯合不滿勢力，也吸引活躍的學生加入。<sup>9</sup> 面對複雜的校園環境，胡適與其他校長力求維持學校在中央與地方政府、軍人之間的平衡。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國民黨員）面對教育部長朱家驊（1893-1963）學校主管與院系主任更動人選當使「穩健分子」優先要求，即回答要以「在學術上頗有成績」為選拔標準，參與政治連署多出於一時衝動，宜透過校長規勸使之「自行覺悟」。<sup>10</sup> 梅氏在清華教授聞一多遭人暗殺後，既探視其家屬、安撫同人情緒，也盡力照顧赴美使館躲避的清華教授。<sup>11</sup> 梅氏以行動表現學術自主態度，維持學術與政治互不干擾。

相關記載顯示，胡適在處理1947年5月學潮期間的北大校務之際，顯露出行政與決策經驗不足的問題。<sup>12</sup> 5月下旬，政府發動青年軍退伍者壓制各地學潮。5月31日，北大學生會決定支持南方學生抗議行動，將在6月2日發動遊行。胡適、梅貽琦面見北平行轅長官李宗仁後，回校召集學聯代表訓話，勸阻遊行，學生亦觀察到校長們是「用心良苦」。6月1日，學聯發表不遊行聲明。<sup>13</sup> 6月2日晚，北平市長何思源拜會北大校長，胡、何二人參觀學校附近學生堆築之工事，在場學生出言質問致氣氛緊張。胡適見狀帶走何。不久之後，景山西街前來一批軍人與清華學生發生言語衝突，清華學生躲入北大西齋宿舍。軍警包圍宿舍大門要求交人遭拒，衝突一觸即發。胡、何二人獲知情況即到場疏通。何離場後，軍警包圍胡適座車，不許學生接近，胡主動下車與學生談話，學生哭訴委屈，有學生趁機喊出打倒特務，並高呼「胡校長保護我們！」據說胡適當時「臉

<sup>9</sup> 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38-241。其實校園內活躍學生不多，便有北京大學學生在1948年10月下旬觀察到：絕大多數學生是「無所謂派」，最易出頭之「風馬牛派」人數也不多。羅榮渠，《北大歲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383，1948年10月26日。

<sup>10</sup> 黃炎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31-232，1946年6月25日。

<sup>11</sup> 參見黃炎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頁236-237，1946年7月15-17日。

<sup>12</sup> 白吉庵，《胡適傳》，頁420。

<sup>13</sup> 羅榮渠，《北大歲月》，頁132-133，1947年5月30日、6月1日。有學者以朱家驊電謝胡適，認為胡等校長此舉「幫了國民黨大忙」。白吉庵，《胡適傳》，頁436。



色發白」，吞吞吐吐說：「這是誤會」。<sup>14</sup> 當日深夜，胡適致函北大學生鄧世華重述易卜生所言「把你自己鑄造成器」主張，努力改革與建設國家。胡、何稍後均為製造雙方困擾去函致歉。<sup>15</sup> 這種表現並不討好。6月23日晚10時半，在校長室的胡適覺得胸悶，即口含硝基甘油藥片並休息，胡在日記寫下這是一年來第二次「警告」，是「近來太辛苦」。<sup>16</sup> 直到1948年中，胡適欲辭卸校長職，獲教育部長朱家驊極力慰留，表示「北大不可無兄，北方尤賴兄坐鎮。」<sup>17</sup> 明示政府知道胡適與北大在北方學界與輿論界之重要地位。

政府與蔣介石曾經期盼胡適入閣從政。但1947年間傅斯年（1896-1950）指出胡適應維持在野之姿：為使中共不得勢，「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進」；「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保持批評的力量……今日鬥爭尖銳強烈化，如《獨立評論》之free 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sup>18</sup> 胡適最終去電拒絕入閣。<sup>19</sup> 胡適維持在野身分，提出個人政局見解，追求改革而非暴力抗爭，展現他與中共解決現實政治路徑之分歧。

有幾篇公開文章展現胡適追求和平改革、自由的信念。1947年5月18日，胡適表示，蘇聯用「擴張他的勢力範圍來謀他本身的安全」，美國用「堅定與耐

---

<sup>14</sup> 羅榮渠，《北大歲月》，頁135-136，1947年6月1日。如果在場學生敘述無誤，胡適與中日戰爭時期蔣夢麟為宣洩學生激昂情緒，走在反孔祥熙學生遊行隊伍前面的舉動顯有距離。見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頁338-339。

<sup>15</sup> 〈胡適致鄧世華函稿〉，1947年6月2日、〈胡適致何思源函稿〉，1947年6月3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下冊，頁201-203、203-204。胡適對學生運動態度，見呂實強，〈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收入周策縱、唐德剛等作，《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教基金會，1991年），頁253-274。

<sup>16</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頁289，1947年6月23日。

<sup>17</sup> 〈朱家驊致胡適電〉，1947年7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頁412。

<sup>18</sup> 〈傅斯年致胡適函〉，1947年2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頁170。3月28日，傅斯年再度去函反對胡適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及五院院長。〈傅斯年致胡適函〉，《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頁190-192。

<sup>19</sup> 〈胡適致蔣介石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頁192。

心」的政策謀安全，<sup>20</sup> 足見他已警覺到蘇聯的擴張政策。8月1日在演講時提及，俄共統治30年，以階級鬥爭方式造成不容忍及反自由的政治制度，以暴力維繫政權，壓迫與消滅反對黨，從一黨專制變成一人專制。中國必須走民主自由之路，以造成自由獨立的國民人格。<sup>21</sup> 胡適隨即發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明確表達反共立場，並舉出三個偏袒自由民主的理由：一、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自由是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二、深信民主政治制度最有包容性，可推行到社會一切階層，最代表全民利益。三、深信民主政治雖非完美無缺，卻曾養成鍾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最後，從歷史角度言，爭取民主之潮流雖曾遭逢無數壓迫與摧殘，至今也面臨暴力摧毀之危險，但絲毫未曾動搖他對民主政治之信念，即民主運動將來一定能獲勝。<sup>22</sup> 這可以說是胡適從大方向著眼，鮮明表述個人政治理念，以期激勵民間。但其想法並未進一步落實為創辦刊物，以團體力量議論時局、宣揚理念之行動。

1948年初，胡適與王聿修、張佛泉（1908-1994）談話，聽出二人對北方形勢感到悲觀，還勸二人要「從積極面去想，去做」。<sup>23</sup> 此語可知胡適尚未對時局發展灰心喪志。同一時期，胡適質疑周鯁生所謂「聯合國列強內無好戰侵略勢力」之說，指明蘇俄從「雅爾達密約」簽訂起，已經成為世界新的侵略勢力。<sup>24</sup> 上述顯示胡適將維護中國與自由民主予以聯繫，視蘇俄為中國與自由世界最嚴重的威脅。周以世界應有英國社會主義之「第三勢力」、蘇俄擴張是靠政治而非軍事，目的在避免戰爭等由回應。<sup>25</sup> 雙方對蘇俄角色認知南轅北轍，無法說服對

<sup>20</sup> 胡適，〈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原載《獨立時論》，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頁1971。本文後收入《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sup>21</sup> 胡適，〈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原載《獨立時論》，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頁1986-1987。本文後收入《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sup>22</sup> 胡適，〈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大中國月刊》，第4、5期合刊（1947年10月10日），頁52。本文後收入《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胡事後表示，該文是予陳之藩回信。〈胡適致陳之藩函稿〉，1948年3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頁351。

<sup>23</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頁351，1948年1月24日。

<sup>24</sup> 另一爭執點為，英、美列強有無形成「聯德日制蘇」的形勢。胡適，〈國際形勢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的一封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頁316-320。

<sup>25</sup> 〈周鯁生致胡適函〉，1948年2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

方。中共察覺胡適的敵視之意，便發文抨擊胡適卸下文人假面具，為國民政府「胡說」。<sup>26</sup> 中共不敢輕忽胡適未可預期的影響力，才會先發動宣傳攻擊以代替防禦。

胡適以個人立場發言，並非以社團或共同連署形式提出，或有更大規模的實際行動之作法，明顯限制了影響力。也因此8月間，陳之藩先後寫信勸胡適要「盡其能盡的力量」，負擔起消除青年「精神貧乏」的責任「以筆報國」，<sup>27</sup> 他期盼由胡適親自領導並集結自由思想知識人為時局奮鬥之觀點，已側面反應胡適個人立場言論影響力之有限。8月12日，胡適發表〈自由主義是什麼〉，期望向社會與教育界闡明護衛自由與民主信念的重要性、要追求改革，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權利等作法。<sup>28</sup> 9月4日的演講詞〈自由主義〉，亦重申此一態度。<sup>29</sup> 誰危害了中國的自由與民主信念？答案指向中共。胡適為維護自由與民主信念，與中共之間的對立亦告確立。

1947-1948年間，胡適發言重點放在維護自由與民主、維護中國對於自由世界抵抗蘇聯擴張的重要意義，也提及反對黨與容忍的必要。他以個人言論宣示「行動」及個人立場，只是近似孤軍奮戰，顯然無法化言論為輿論力量，輔助國民政府扭轉1948年趨於劣勢的軍事形勢。他眼見國民政府東北軍事即將全面潰敗，也不免萌生「滄桑之感」。<sup>30</sup> 12月中，他就離開北京大學與北平了。

---

《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頁322-324。

<sup>26</sup> 懷湘，〈胡適的胡說〉，原載《群眾週刊》，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頁355。

<sup>27</sup> 〈陳之藩致胡適函〉，1948年8月4日、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頁416、420-421。

<sup>28</sup> 胡適，〈自由主義是什麼〉，原載《獨立時論》，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頁2044-2047。白吉庵揭明胡適文章的針對性，見白吉庵，《胡適傳》，頁449。

<sup>29</sup> 胡適，〈自由主義〉，轉引自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2卷，頁810。

<sup>30</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頁367，1948年10月22日。

### 叁、名實不符的「發行人」胡適（1949.11-1953.1）

胡適離開北平，流露失落情緒，視自己為「逃兵」、「難民」。<sup>31</sup> 1949年初，一則新聞報導可能假托胡適、傅斯年二位知識界代表人物對時局的失望與不得不在國共之間選擇其一的複雜感受。據稱胡適和葉公超遊覽南京城外中山陵和天文臺散心時，感嘆：

你們貴黨（當然是指國民黨，因葉曾任國民黨中宣部倫敦辦事處處長）實在不敢恭維，但，我們這般自由分子為什麼還願跟著你們走呢？有一點，就是至少可以保持不說話的自由。<sup>32</sup>

傅斯年據說向國民黨中常委李宗黃激越地表示：

貴黨實在太洩氣了，現在弄得連我們幫腔的人都不如，我們站在幫腔的地位，還願意為自由做出一切；你們呢？身為國民黨的中常委，卻東一個，西一個地各安天命，好像對共產黨的威脅根本麻木似的，其實，國民黨先天地站著一個優越的地位，你們為什麼不站出來喊：「為自由而戰」！<sup>33</sup>

外國駐華記者觀察到，中共以周恩來作為新聞發言人，國民黨方「好的、誠實的消息來源」便是傅斯年、蔣夢麟、胡適、蔣廷黻等人，後者從大的歷史與政治方向分析國民黨情勢，以利記者瞭解中國政情。<sup>34</sup> 顯然是當前局勢迫使自由派知識分子公開選擇與國民黨「站在一起」，一反先前不表態或「不黨」的姿態。<sup>35</sup> 若

<sup>31</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頁375，1949年1月1日。

<sup>32</sup> 諸葛黛，〈南京完了廣東如何〉，《新聞天地》（上海），第68期（1949年4月28日），頁3。胡適日記並無相關記載。

<sup>33</sup> 諸葛黛，〈南京完了廣東如何〉，《新聞天地》（上海），第68期（1949年4月28日），頁3。

<sup>34</sup> Stev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 eds.,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Press of California, 1987), p. 93.

<sup>35</sup> 也因此有學者認為，國共戰爭使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爭之中主動或被動放棄自由主義理想和「不依附政治勢力」的行為準則。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的命運〉，頁

從報導胡、傅力挺「自由」與「願意維護自由的政權」角度言，1949年反對國共議和就是意料中事。1月29日，胡適特意在日記貼入戰犯名單，<sup>36</sup> 此舉有濃厚自我提醒成分——要與能「維護自由」的國民黨站在一起。

同年3月下旬，胡適的臺灣之行由板橋林本源家族捐輸旅費，有人諷刺胡適是「白華人的王子」。<sup>37</sup> 胡適在3月27日的公開演說中力挺「自由」之必要，也為自由下定義，表示自由不是受限於資產階級的奢侈品，是生活必需品。他以為「自由是一切動作都要自己作主才算數的」，進一步指出中國文化在百家爭鳴時代有自由，統一帝國時期不若以前自由。「現在正是一個危險的時代，自由與不自由的鬥爭，容人與不容人的鬥爭，正在激烈進行中。在這個時代裡，竟然還有人在說風涼話，說自由只是有產階級所需要的奢侈品。朋友們！等到那末一天，不但沒有言論自由，連不論的自由也要失去；不但沒有思想自由，連不思想的自由都會失去的時候，大家才會恍然感到自由不是奢侈品，而的確是一種必需品了。」<sup>38</sup> 胡適難得表述得如此直白無隱，巧合地呼應1月可能假托的「保持不說話的自由」新聞。

胡適在1949年2月間讀到北京大學前同事、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最後的論文和書信，深喜陳氏於生命最後走上民主自由道路，<sup>39</sup> 和他想法一致。胡適對此與時局發展感慨良深，在4月前往美國的船上為將出版的陳氏著作寫序，提及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區別就在「反對黨派之自由」、「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sup>40</sup> 這和他在1948年公開發表之言論相一致。

1949年，針對如何集結自由人士力量以支持政府，胡適提議成立週刊，其他

---

68。

<sup>36</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頁381，1949年1月29日。

<sup>37</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頁379，1949年1月22日；畋文，〈胡適在臺灣〉，《新聞天地》（上海），第67期（1949年4月21日），頁16。

<sup>38</sup> 畋文，〈胡適在臺灣〉，《新聞天地》（上海），第67期（1949年4月21日），頁17。

<sup>39</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頁387，1949年2月23日。

<sup>40</sup> 胡適，〈序言〉，收入陳獨秀，《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廣州：自由中國社出版部，1949年），頁8、11。

人在討論後主張出日報。王世杰也親率雷震去溪口，向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報告，請胡適出面領導可能的「自由中國運動反共組織」或辦報案，獲得蔣同意資助經費。<sup>41</sup> 唯隨著上海情勢緊張，不可能辦報，只能辦雜誌。因此，胡適在船上即寫信討論相關公事。但從信文顯示，胡適心情鬱悶，雜誌〈宗旨〉無法成文，只有擬稿「一篇短文字」。他促請雷震一定要和願意參與編務的崔書琴（1906-1957）、張佛泉、毛子水（1893-1988）仔細斟酌文字內容，「最好完全重寫過」，必要時可找傅斯年寫〈宗旨〉。正式發表〈宗旨〉，也不宜具名。<sup>42</sup> 如此慎重，自為凝聚共同意見。6月下旬決定刊物在臺灣創辦，異於張、崔主張在香港辦理以脫離臺灣省府干涉之前議，公推毛子水寫宗旨，由王聿修負責事務。<sup>43</sup> 10月20日，雷震結束廈門工作抵達高雄，決定在短期內發行《自由中國》創刊號。雷震即與杭立武、王聿修談話，確定所需經費與爭取教育部補助。<sup>44</sup> 此時，雷震身為蔣介石幕僚，力求整合諸人意見，使刊物順利發行。其11月2日之記述可見一、二：

《自由中國》社張、毛、王諸先生在家中等候甚久，討論出版辦法，王、張仍主張發稿而不辦刊物，予極力反對，毛亦主張維持其決定，商討結果，仍出半月刊，8號集稿、10日交稿、15日出版。<sup>45</sup>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提過可斟酌〈宗旨〉文字之毛、張二人意見不同：王、張不主張立即出刊，毛、雷堅持辦刊物。後者意見最終出線，訂定出刊時程。若再與胡適書信琢磨，刊物問世更將遙遙無期，於是雷震選擇「先斬後奏」——並未徵詢胡之同意，逕行將胡適擬稿充作《自由中國》宗旨定稿，且將胡列名為「發行人」。1940年代不辦刊物的胡適，竟然成為臺灣一本刊物的發行人，確實造成一定的宣傳作用，凸顯刊物堅持反共、結合愛好自由者之意義。出刊日下

<sup>41</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1991年），第31冊，頁166-167、172、174，1949年3月25日、4月1、4日。

<sup>42</sup> 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下稱《萬山不許一溪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2。張、毛、崔的參與，見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1冊，頁172，1949年4月1日。

<sup>43</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1冊，頁242、244，1949年6月18、21日。

<sup>44</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1冊，頁347，1949年10月23、24日。

<sup>45</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1冊，頁354，1949年11月2日。

午，「竟有人上門訂購或購買，聞有一家書店，10本立刻銷售，可見對外聲譽之隆。其原因當歸發行人之大名也。」<sup>46</sup> 事實上，胡適健康狀態不佳，未與王世杰等臺北友人通訊，渾然不知《自由中國》創刊。<sup>47</sup> 正因如此，雷震向胡適求文時，即籲請胡適莫再遲疑，宜接受發行人頭銜，「玉成」刊物立足社會發揮影響力。雷震以社會期許遊說胡適：

本刊在社會上已發生相當號召力，這都是由於先生為發行人之故，如先生專號不來文，不獨減低編輯人之勇氣，我們對社會不好交待，因此請先生千萬千萬寄來。<sup>48</sup>

胡適對雷震作法頗不以為然。他寄出短文以示支持刊物，卻同時表達不悅，希望由王世杰、傅斯年、毛子水、張佛泉討論更切合需要的宗旨及更換發行人：

我最不高興的是你用我的姓名為「發行人」。這是作偽，不是發起一個救國運動的好榜樣。我想請你老兄考慮，另請一人為發行人。……雪艇、孟真、子水、佛泉諸人一定有更好、更切要的意見。<sup>49</sup>

由胡適列舉 4 人顯示，王世杰、毛子水、張佛泉、傅斯年是胡適認定最「理解他」的老朋友，王在政、學兩界活動，餘 3 人以學界活動為主，雷震不屬「作文章」的學者群；胡適可能認為雷震（或背後代表的政界）有求於他，言詞中無形流露一些距離感。胡適列名刊物發行人「門神」的號召力既展現在刊物銷售，也吸引新成員投稿及參與社務。如南京中央大學畢業生聶華苓（1925-），之所以成為刊物唯一女性成員，即經由時任《自由中國》編輯李中直介紹，和雷震面談後加入該社，由文稿管理者、投稿者、文藝編輯到編輯委員。<sup>50</sup> 雷震作為實際組織者的分量，與胡適「門神」作用的差異清晰可見。

1949年底起，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灣，臺灣海峽兩岸政權分治，為20世紀中

<sup>46</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1冊，頁366，1949年11月20日。

<sup>47</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1冊，頁376，1949年12月3日。

<sup>48</sup> 〈雷震致胡適〉，1949年12月8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4。

<sup>49</sup> 〈胡適致雷震〉，1950年1月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9-10。

<sup>50</sup> 聶華苓，《三生影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160-161。

國歷史重大變局。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代表——胡適寓居美國，掛名在臺發行之《自由中國》發行人，其為自由主義代表象徵及其寫作刊物宗旨、陳著書序揭櫫之自由民主理念，均成為刊物創刊初期文章發揮的中心。雷震雖非撰文「學者群」，仍因攻讀法政且深悉實際政治運作，寫出刊物首篇討論反對黨問題之文章，從而展現胡適所持理念之啟發意義。該文開篇引述〈書序〉文字，指出真正民主政治與反對黨息息相關。執政黨不獨要有容忍反對黨的雅量，且要允許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和出版的自由、與執政黨享受平等權利及平等機會。要確保、維繫少數黨及國民個人的自由與獨立性，必須注意經濟制度，維持私有財產。政府宜減少國營事業範圍，獎勵民間事業投資；生產事業勞資關係要合作協調，並注意規劃稅制以助成社會福利實現。<sup>51</sup> 這已經延伸了胡適所述的民主政治真諦在反對黨觀點。政府是否維護反對黨與個人的自由，即為民主政治實現與否的關鍵。雷震文章所言既是針對臺灣當時政局發展（國民黨實施改造之前）提出積極期盼，<sup>52</sup> 也是以中華民國政府的聯盟者（自由主義者包括在內）的立場作出善意發言。

1952年底，胡適返國訪問，於紀念會致詞坦承對「發行人」角色感到「慚愧」，期望由實際負責的朋友（指雷震）擔任發行人，<sup>53</sup> 「慚愧」自有原因，或可從創刊至1953年2月前胡適具名10篇文章屬性進行觀察。其中2篇寫於創刊之前，5篇為演講稿，3篇翻譯稿，4篇屬於談論國際政治局勢下的中國情勢，2篇談民主自由問題。<sup>54</sup> 包含〈宗旨〉在內只有3篇文章可算是專為《自由中國》而作。按1950-1952年間，胡適擔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

<sup>51</sup> 雷震，〈反對黨之自由與如何確保〉，《自由中國》，第2卷第7期（1950年4月1日），頁14-16。

<sup>52</sup> 雷震當時就料到，該文一定會遭到黨內人士批評譏罵，甚且有刊物刻意組織之耳語。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2冊，頁83，1950年4月13日。

<sup>53</sup> 胡適，〈《自由中國》雜誌三周年紀念會上致詞〉，頁4-5。

<sup>54</sup> 10篇文章及刊登時間為〈自由中國的宗旨〉（1949年11月20日）、〈民主與集權的衝突〉（1949年11月20日）、〈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1950年2月1日）、〈史達林雄圖下的中國〉（1950年11月16日）、〈致本社的一封信〉（1951年9月1日）、〈十年來中美關係急速惡化的原委〉（1951年9月1日）、〈《自由中國》雜誌三周年紀念會上致詞〉（1952年12月16日）、〈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1952年12月16日）、〈東亞的命運〉（1953年1月1日）、〈三百年來世界文化的趨勢與中國應採取的方向〉（1953年2月1日）。



與蔣介石友善互動。<sup>55</sup> 胡適針對冷戰局勢撰文，選題及內容乃關切國際局勢對東亞所造成影響，雖非直接討論臺灣時局或獨家撰述，仍合乎刊物揭櫫反共宗旨。胡適文章與臺灣時局最有關連性者，就屬1952年以公開信向政治當局抗議言論自由壓制問題（詳下）。由於個人健康因素、一度消沉的心境所致，胡適對於撰文議論時事之意願較諸1930年為《獨立評論》「盡義務」之熱情為少。

如同雷震對「中國自由黨」籌組一事表示「廣納自由人士於此一組織之內，這是萬分困難的事。」<sup>56</sup> 此話同樣適用如何統合《自由中國》社務方針與選文。創刊諸人排除內容「空泛」的政界人士文章，違背雷震致力用刊物象徵反共自由人士大團結方針，不免讓雷震憂慮「如此討論，此誌能維持多久，實成問題。殷、許二君之言，不合於情理，最後交毛子水決定。」<sup>57</sup> 由此可知，雷震將選文決定權交由胡適信任之毛子水決定，以示尊重學人。胡適回信則流露高姿態，要雷震寫信字跡清晰；以為頭3期的文章內容並不充實，只有其老友傅斯年所寫者較好。<sup>58</sup> 雷震經常發揮纏功寫信向胡適求稿，利用書信報告社務，一併提及臺灣政情發展，盡力告知胡適如能定期（如兩個月一篇）寫文章，對《自由中國》所有同人與刊物讀者都是正面的鼓勵。<sup>59</sup> 雷震就是以軟性的「纏」與「求」，透過王世杰兒子王紀五就近告知訊息、交送刊物，請胡適寫稿以貼近「發行人」角色。雷震求稿，自是冀望讓胡「負責」，由要求1、2月寫1篇，到1年寫2篇即可的退讓過程中，也如前人研究指出帶有幾分埋怨意味。<sup>60</sup>

<sup>55</sup> 友善互動可參見運用蔣介石、胡適日記之近年研究，如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2011年3月），頁19-22；陳紅民，〈臺灣時期蔣介石與胡適關係補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2011年9月），頁145-148；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30期（2011年12月），頁110-121。

<sup>56</sup> 〈雷震致胡適〉，1949年12月8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5。

<sup>57</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1冊，頁36，1949年11月23日。

<sup>58</sup> 〈胡適致雷震〉，1950年1月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9。

<sup>59</sup> 〈雷震致胡適〉，1950年3月23日、4月18日、4月2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2-14。

<sup>60</sup> 何卓恩，〈思想與角色：胡適在《自由中國》的言論解讀〉，《安徽史學》，2009年第5期（2009年9月），頁65。

《自由中國》為勸請胡適負起發行人責任，曾為籌組週刊編輯委員會提出草案，以胡適任主任委員，由雷震、羅家倫（1897-1969）、梁實秋（1903-1987）3 委員於胡適出國期間出任代理人。更強調此草案獲得王世杰、杭立武、羅家倫等人同意。<sup>61</sup> 該建議並未獲得胡適回應，籌組週刊終未成事。此事顯示，刊物一度構想以年紀較長、較持重，且與胡有舊交之「朋友」出長編輯事務。到1951年《自由中國》爆發社論〈政府不可入民於罪〉引起軍事機關不滿，胡適稱譽該文為刊物「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夏道平（1907-1995）執筆），使刊物遭受軍政黨壓力，不得不刊登經陶希聖修改發表〈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作為道歉。該刪修之社論讓毛子水「晚上睡不著覺」，自尊心大為受傷。胡適正在為子姪輩汪漢航遭到軍事機關指控「私套外匯」案向官方抗議，察覺刊物遭到壓迫，便以「抗議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贊成社評立場」為由，辭去刊物發行人。<sup>62</sup> 胡適稱許夏文，應為此文落實刊物〈宗旨〉之「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sup>63</sup> 《自由中國》經過討論，以毛子水、金承藝、李中直、雷震等 8 人具名編委會決議，企盼胡適續任發行人，以領導爭取言論自由。北大師生毛子水、金承藝、李中直具名，對胡適既動之以情，也說之以理，信中更指明胡適的作用就是「爭取言論自由的領導人」，期盼他繼續對言論方面有所指示：

中國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即僅就爭取言論自由這一點來看，非由您積極領導不可。《自由中國》發刊以來，能夠得到一般讀者的愛護而政府尚可優容（他們自己認為是很優容的）的，正因為發行人是您的原

<sup>61</sup> 〈雷震致胡適〉，1950年8月15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8-21。

<sup>62</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頁112，1951年6月12日；〈胡適致雷震〉，1951年8月11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23-24。毛之所以夜晚難眠，正因陶文有日後學者所言「標誌新聞自由遭到十足踐踏的可恥記錄」的作用。林淇濤，〈從「侍從」在側到「異議」於外：試論《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機器的合與分〉，收入李金銓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26。何卓恩認為夏文是《自由中國》全面自由化之標誌。何卓恩，《《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威權體制下的民主考驗》，頁137。章清謂陶希聖刪修是「檢討的文字」，也有其道理。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頁104。

<sup>63</sup> 〈刊物宗旨〉，《自由中國》，第1卷第1期（1949年11月20日），頁2。刊物每一期均刊登之。

〔緣〕故。現在臺灣的刊物，只有我們《自由中國》才像一個輿論的刊物——這是大家所公認的。<sup>64</sup>

9月11日，胡適覆信仍然關切刊物有無言論自由，與政府有否限制言論自由？<sup>65</sup> 政府高層除由陳誠出面安撫外，胡適更於10月中旬接到羅家倫（同樣參與國民黨改造工作，亦曾在《自由中國》撰文6篇<sup>66</sup>）書信，動之以師生情誼，勸胡勿與政府對立，並稱辦刊物某君（即雷震）「方面很多」、「手筆很大」。羅指出，雷震與政府對立，將胡適牽扯入內，遭到王世杰批評，認為「對胡先生太不公道」。羅並稱「該刊編輯部中大有問題，有二、三年青人頗偏激（子水亦對我說過此點），有一人係前《中央日報》編輯，而被某公令其去職者，其抑鬱不平之氣，常現在辭色，他們無形中推某君者作小英雄，某君亦常有寂寞之感，但彼等不知某君優點與弱點，『殺君馬者道旁兒』，此亦雪兄與倫以友好態度為之深抱隱憂者也。」最後建議胡適不妨先不問相關紛爭，當胡無法親自到場領導，再輕描淡寫脫離發行人地位，「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sup>67</sup> 羅函出以相信陳誠說詞立場，從人格問題與交往關係質疑雷震。此種質疑站在事情前後順序言，對雷震未盡公平與失實，有學者質疑其形同「誅心」之論。<sup>68</sup> 羅氏既出此言，更不可能與《自由中國》往來，是胡適在臺朋友中頗早與《自由中國》分途者。

<sup>64</sup> 〈雷震等致胡適〉，1951年9月7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26-27。

<sup>65</sup> 〈胡適致雷震〉，1951年9月11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28-29。

<sup>66</sup> 六文多談新疆、印度、蘇俄關係，係因羅氏曾考察新疆、駐節印度。〈悲憤話新疆〉（1950年2月16日）、〈蘇俄的國策和動向〉（1950年6月1日）、〈值得印度反省，值得世界知道〉（1950年8月1日）、〈蘇俄侵略的技術〉（1950年9月1日）、〈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1950年10月1日）、〈中印間關於西藏問題的幕內證件〉（1951年1月16日）。

<sup>67</sup> 陳誠去函外，雷震則遭到責怪處理不周到。見林淇濤，〈從「侍從」在側到「異議」於外：試論《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機器的合與分〉，頁326；〈羅家倫致胡適函〉，1951年10月15日，收入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頁276-278。羅家倫於9月曾轉達王世杰相同意見，見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頁150-151、153，1951年9月1、4日。

<sup>68</sup> 陳儀深，〈一九五〇年代的胡適與蔣介石〉，《思與言》，第47卷第2期（2009年6月），頁216。至於羅對雷震是否在外營商的懷疑，並未於一時斷絕。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4，頁184，1952年12月31日。

羅家倫書信點出兩個重要問題：一為胡適願意參與《自由中國》運動，正因認為在戰後闡述自由思想上做得不夠，面臨政治變局之際願意與處於政治聲望下墜、但堅定反共的蔣介石合作，予其道義支持，以維繫個人自由的根苗與不說話的自由，成為知識界支持力量象徵之一，造成「兩利」；繼續維持胡適與高層領導合作關係亦係王、羅等人最優先考量，不欲在毛邦初案<sup>69</sup> 喧騰一時之際，為幫助《自由中國》與雷震等人撐腰導致蔣、胡合作破裂，形成「兩害」。這是王世杰表示不滿，以及羅家倫提醒胡適「名器不可以假人」之真意。羅、王，以及其他國民黨人之另一不滿，是認為雷震未「私下處理」此事，讓胡函公開刊登，更不符合國民黨人行事慣性。畢竟，在他們眼裡，《自由中國》成立之工具意義遠高於其維繫之價值意義。胡適當時是否意識到這層意義未必清楚，但是日後他確如王、羅二人預期到面臨選擇。胡適當時並不知道，雷震因為刊登信函，遭到蔣介石誤會，本擬在改造會決議「開除黨籍」，經在場人士反對始改為「警告」一事。<sup>70</sup> 這也可說是讓雷震從蔣介石原先的追隨扈從逐步關係疏離，到1955年初由政治人轉為專職新聞人角色之始。

羅氏信函所指問題之二，即從創刊開始所存在之意見整合，不僅針對邀稿者，內部成員之間亦然。羅函所指者即自臺灣《中央日報》主筆去職的少壯派殷海光（1919-1969）。殷海光曾經向妻子自承結識以來之行為，思想雖不夠深沈，清晰度在中國哲學界應可名列前茅；雖不免在行動上流露得意之色，也逐漸有自覺地消去不少。<sup>71</sup> 如以此個性觀之，已與國民黨分手的殷氏堅持討論問題、說一是一的清晰思想，在要為反共大局而處處忍耐的前輩們眼中自不免「抑鬱不平」，甚至如同胡適幾年後之批評：殷「是一個書獃子」。<sup>72</sup> 實際主持社務的雷

<sup>69</sup> 1951-1958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控告前空軍駐美辦事處長毛邦初以追回空軍公款之事件。毛拒絕移交辦事處檔案與公款，對外宣稱因揭發貪污弊案遭迫害。政府於1951年8月間在美提訟，並指派司法行政部次長查良鑑長期駐美處理該案，毛氏於1952年潛逃墨西哥，1954年6月美國法院判決政府勝訴，得以追回大部公款。至1958年雙方達成和解。張淑雅，〈毛邦初案〉，許雪姬編輯，《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2005年），頁395。

<sup>70</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頁155，1951年9月7日。

<sup>71</sup> 〈殷海光致夏君璐〉，1953年6月3日，殷海光、夏君璐著，殷文麗編錄，《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347。

<sup>72</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87，

震如何整合兩種不同意見就煞費苦心，殷海光寫的社論在雷震看過後，得由穩練的夏道平、戴杜衡（1906-1964）（1950年代後期加入宋文明）字斟句酌，他們保留文章敢言的氣魄，負責拔掉或磨除言詞間的刺。<sup>73</sup> 如毛子水不滿意夏道平寫時事述評稿，提議取消，獲得編輯會通過，雷震即照辦。<sup>74</sup> 此均可見雷震用心調解與尊重毛子水的心理。但雷震舉措難免引發社內少壯者之不滿（偏袒老輩），殷氏亦以「老國民黨」心理稱之。與殷一度比鄰而居、年齡較近的聶華苓提到殷之批評，和編輯委員會討論事情予她之影響：

雷震！無論在基本的思想形態、行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習慣上，他和老牌的國民黨員沒有根本上的差別！

我是編輯委員會裡最年輕、也是唯一的女性。旁聽編輯會議上保守派和開明派的辯論以及他們清明的思維方式，是我的樂趣，不知不覺影響了我的一生。……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為人的嶙峋風骨，和做人的尊嚴。<sup>75</sup>

彼時胡適對於《自由中國》內存在思想差異，感受或不如毛子水、羅家倫等人直接及深切。但此問題終究在《自由中國》與作為精神象徵胡適之間隱隱攪擾。

由事後發展看，胡適並未質疑雷震人格；也未如《自由中國》所希望之表態擔任發行人。胡適有個人考量與想法，不想為某一邊「牽著走」。胡適透過王紀五轉達極信任《自由中國》之意，希望「多談時事，少登原則性之文章」，要外間知道刊物與政府站在一條線上，要先得政府信任而後予以批評。此一態度也不免讓為刊物與官方打交道的雷震以為「在中國今日談何容易，此點胡先生猶不免書生也。」雷震也說過，胡欠缺鬥爭性格，並不適合當「政治人」。<sup>76</sup> 此言呈現胡適對刊物的善意與關心，與他將刊物定位為政府的聯盟者態度。雷震認為，胡

---

1960年11月17日。殷海光曾說自己是「五四後期人物」，保留銳氣與浪漫主義。〈殷海光致張灝（一）〉，潘光哲編輯，《殷海光書信錄》（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271。

<sup>73</sup> 聶華苓，《三生影像》，頁163。

<sup>74</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4冊，頁12，1952年1月17日。

<sup>75</sup> 聶華苓，《三生影像》，頁162。

<sup>76</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4冊，頁66、155，1952年5月10日、11月12日。

適言論雖出於善意，卻不貼近本地現實，也不甚理解國民黨處事作風，一切苦楚唯有雷震自知。《自由中國》陸續刊登文字（包括談救國團設立、國民黨改造、監察院與輿論問題）與政府有所摩擦，《自由中國》實際主持人雷震和高層的關係也逐漸產生變化，胡適所意指聯盟關係顯需調整。

對此，刊物相關人員（特別是少壯派）即不滿胡適在刊物發行人角色之曖昧與消極表示。1952年中，殷海光一文或可視為對老輩「消極以對」之不滿：

總而言之，中國底自由知識分子多少是癱瘓了，是潰散了，是被洪水沖垮了，是零散了。如今只剩下幾許萎縮的幽人，在那裡過度著不冷不熱、不痛不癢、不喜不憂的灰色生活。他們已經做了現實存在的俘虜。他們似乎在那裡想掙扎，可是又怕響聲太大。他們似乎在那裡想幹，可是又怕太費勁。他們似乎想說話，可是又怕別人不喜歡。他們似乎想及時行動，可是又怕太迂緩。像這個樣子的自由人，自身已經先從精神與思想的基礎崩潰下來，怎麼還能啟導大家，扭轉乾坤，再造一個新時代？<sup>77</sup>

他特別提出，作「自由人」的必須條件是具有「自由精神」，亦即自主、自動地尋求真理、確立實踐原理、創造情境，「雖無文王猶興」，「雖千萬人吾往矣」。<sup>78</sup> 殷海光充滿激情的文字，顯示他在外表講理性的過程中，內在所蘊含的強烈浪漫情緒，只有近友才見得到與欣賞得到。<sup>79</sup> 當老人不公開說話，那誰來說？年輕一輩如殷海光此五四後期人物捨我其誰，當努力彌補前人因為不敢說、不敢作導致中國大陸落入中共控制的後果。殷海光言詞或可推演為，面對現實，敢說又敢嘗試改變，更是必要。

胡適於1952年11月間訪問臺灣前，刊物編輯會「均不贊成」胡辭發行人，並

---

<sup>77</sup> 殷海光，〈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民主評論》，第3卷第17期（1952年8月15日），頁9。有研究者注意到，這樣的文字並未放在《自由中國》，反而刊登於《民主評論》，反映由國民黨出走之殷海光與徐復觀共同觀感。李淑珍，〈自由主義、新儒家與一九五〇年代臺灣自由民主運動〉，《思與言》，第49卷第2期（2011年6月），頁43。

<sup>78</sup> 殷海光，〈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頁11。

<sup>79</sup> 聶華苓，《三生影像》，頁188、189、195-196。

以為「如果胡先生不出來，本刊只有停刊。」<sup>80</sup> 聶華苓拒絕雷震獻花建議，實即一種委婉表態。事實上，雷震也希望透過接機以「作大」胡適回國的事件，讓胡更名正言順成為自由人士的總代表。<sup>81</sup> 胡適在回國的公開演講上，一方面表示對《自由中國》爭取言論自由努力表示嘉許，卻同時表示他無法在臺灣擔任刊物發行人，希望另請高明。據說當胡適講出此語時，原本因為嘉許之言而激動的聽講者頓時安靜。<sup>82</sup> 這或許反映出在場群眾直接的情緒與疑問：主張爭取言論自由的胡適不再支持《自由中國》，不再願意當該刊的「擋箭牌」？<sup>83</sup> 也因此眾人仍在晚宴上予以挽留，由雷震提出折衷意見：組織刊物編輯委員會，將胡名列委員之一，刊物刊登委員名單，獲胡當面同意。<sup>84</sup> 刊物並於1953年初完成發行人變更登記，<sup>85</sup> 以雷震為發行人。

胡適或許亦知如此無法對外釋疑，便於12月編輯人協會演講中演講如何爭取新聞自由，要以民間報紙為主力，並以他自己和北洋軍閥、南京國民政府互動爭取言論自由經驗勉勵在座者；隨後親自撰文交與雷震及《讀賣新聞》發表。<sup>86</sup> 由此觀之，胡適並未斷絕與臺灣這份刊物之聯繫與關切，只是想貫徹自己「名實相符」的意念。羅家倫退出寫作供稿。與胡適相善，甚至是有幾分「代言人」意味的毛子水也依舊列名於刊物編輯委員中，並未就此退出；王世杰仍舊與雷震會面表達觀點。胡適與蔣介石仍舊互動友善。是故，胡適的朋友群與胡適本人，與刊物主持人雷震的互動及意見交換持續存在。

<sup>80</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4冊，頁151，1952年11月5日。

<sup>81</sup> 聶華苓，《三生影像》，頁165。

<sup>82</sup> 聶華苓，《三生影像》，頁166。

<sup>83</sup> 〈雷震致胡適〉，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43。

<sup>84</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4冊，頁164，1952年11月28日。

<sup>85</sup> 〈雷震致胡適〉，1953年2月2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36。

<sup>86</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4冊，頁170、178，1952年12月9、24日。此文即〈東亞的命運〉，《自由中國》，第8卷第1期（1953年1月1日），頁4；〈アジアの運命〉，《讀賣新聞》，1953年1月4日朝刊，頁6。

## 肆、「顧問及調解人」胡適（1953.1-1960.9）

就文章發表數言，胡適卸去發行人之名以後，發表篇數未見增加。在22篇文章中，主動投寄2篇，專稿5篇，被動刊載4篇，外稿7篇。追思學人故友及學術性文字居多，對於自由派同人講話者亦有7篇。就發表時段言，1954年3篇，56年4篇，57年無，59年9篇，55及58年各2篇，60年1篇。<sup>87</sup> 57年全年無文章，自因胡適在該年2月胃潰瘍病倒，施行手術並靜養之故。59年數量最多，與胡適前一年4月正式赴臺定居，將演講稿交與刊物發表有關，既凸顯支持刊物之意，<sup>88</sup> 及其將《自由中國》視為臺灣言論自由象徵指標。胡適也希望調解《自由中國》和執政者之間漸趨鮮明之歧異，只是就最後結果（雷震以匪諜案遭到軍法判刑、《自由中國》停刊）論，胡適的期盼顯然落空。若將胡適辭去發行人後與《自由中國》互動，再以赴臺定居前後為界分，或可得出一些徵象。

### 一、赴臺定居前（1953.1-1958.4）

儘管晚輩殷海光批評老輩「消極」作風，前「發行人」胡適仍關注殷海光發表文章及其影響力。特別是殷海光接納周德偉（1902-1986）建議，閱讀並翻譯《到奴役之路》，既解答自身困惑，也為中國自由主義補足有關經濟平等與自由論爭之思想基礎——即以經濟自由為思考準則，消除共產主義等於經濟平等之迷思。儘管胡適在《自由中國》「少言」，仍詢問一系列翻譯是否引發外間迴響？他於1954年初關切地提到，「以其（筆者按：海氏論述經濟自由論）最不合時宜，故是對症最良之藥。但恐陳義過高，今之從政者未必肯去細心閱讀耳。」<sup>89</sup> 胡憂心良藥是否因「陳義過高」流為書生之談。胡適在支持蔣介石連任第二任總

<sup>87</sup> 何卓恩，〈思想與角色：胡適在《自由中國》的言論解讀〉，頁63-65。雷震在1958年曾言，胡適8年來專為刊物只寫了3篇文章。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165，1958年9月19日。

<sup>88</sup> 〈雷震致胡適〉，1959年1月31日、2月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54、160。

<sup>89</sup> 〈雷震致胡適〉，1954年2月22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64。



統之際，仍希望刊物切實傳播自由主義理念，釐清從政者的謬誤觀念——學習共產主義對抗共產主義。按1950年代前期起臺灣政局發展有學習共產主義之態勢（如蔣介石成立總政治部，以蔣經國主導軍中政工系統）。殷氏之翻譯或許在現實面無法為執政者所「用」，但將自由主義者新近對時局深切省思與見解引介予臺灣知識分子已具深遠意義。這也是殷海光落實自身所言：將民主思想「有系統地介紹給國人」、「使大家知道民主思想是這麼個東西」。<sup>90</sup> 由此而言，胡適展現其度量與肯定殷海光推廣自由思想之努力。

1954年3月5日，胡適演講〈從《到奴役之路》說起〉，他指出自己在1941年發現，蘇俄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是政治獨裁，到最後走上「到奴役之路」。他提出個人對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理解：「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計劃經濟，所以儘管自由主義運動者多少以為：社會主義當然是將來必經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卻以一個大經濟學家的地位來說：一切社會主義都是反自由的。」胡適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懺悔自己與不少知識分子於1920年代起產生的錯誤觀點「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sup>91</sup> 羅志田指出，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有從個人主義往集體主義轉移之階段，國、共兩黨看到蘇俄為成功以革命奪權，自由主義者看到更多奪權後的建設與改造社會的措施。俄國進步快速，造就新民族便打動了胡適。胡適之所以放棄對俄國之夢想，係因「雅爾達協定」、戰後蘇俄對東北清洗措施，使胡在民族主義基礎上否定之。<sup>92</sup> 胡適於1954年的演講公開重申自身思想轉變，肯定並重視海氏從經濟為自由主義立論的觀點，也與陳獨秀所言真自由與真民主相呼應。

1955年3月間，由梁實秋發起，由張佛泉向刊物提出，《自由中國》社編輯委員會聯名致函胡適，建議他撰文回應中共掀起清算胡適思想運動，交由他報轉

---

<sup>90</sup> 殷海光，〈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頁4。

<sup>91</sup>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自由中國》，第10卷第6期（1954年3月16日）頁4、5。有論者依此認為，胡適在此修正嚮往社會主義的思想。俞祖華、趙慧峰，〈從胡適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義的趨新與復古〉，《河北學刊》，2011年第9期（2011年9月），頁57。

<sup>92</sup> 羅志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收入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下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頁91-94。也有論者提醒，即便胡適在社會主義往集體主義走的趨勢中，仍然把持住自身立場與主張。白吉庵，《胡適傳》，頁246。

載，以利自由陣營擊毀中共清除自由思想根苗。<sup>93</sup> 此事顯示：同年初雷震正式和國民黨「分手」，並未影響胡適故友梁、張二人與刊物間之友善互動。1955年9月中，《自由中國》原欲刊登商人孫元錦遭特務敲詐致死事件社論及文章，為保安司令部所悉，該部向雷震軟硬兼施地遊說，迫使社方刪除夏道平所撰、經毛子水修改定稿社論。雷震向胡適報告事情處理經過時，亦特要胡適勿激動回信，只要寫一篇文章「支持」刊物即可。<sup>94</sup> 這顯示雷震態度謹慎，不欲1951年的胡適抗議信風波重演。

胡適正忙於寫作《丁文江的傳記》，雖透過留學生陳之藩輾轉表示將寫兩篇文章，<sup>95</sup> 直到1956年4月才發表〈胡適之先生的一封信〉以示支持。胡適在寫文章之外，也捐款予《自由中國》，<sup>96</sup> 顯示雙方聯繫密切與支持意向。所以，難以單從文章數量即論斷胡適與雷震及《自由中國》關係是疏離的。同時，胡適與蔣介石仍舊互動友善。近年有關蔣、胡交往論著也顯示，二人交往從1948-1956年間，確是彼此需要，呈現雪中送炭關係。蔣拉攏及以金錢濟助胡適，胡則在蔣連任總統時予蔣以道義與實質支持。<sup>97</sup> 黃克武提出值得深思的觀察方向：1949年之後，國民黨統治菁英與中國自由主義者面臨在中國大陸政權易手、退居孤島的重大挫折，為圖再起，積極地消弭彼此不滿，突出雙方共識。此時至1956年間，胡、蔣彼此間的思想交往（含反蘇反共的共識、注意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充

---

<sup>93</sup> 〈雷震致胡適〉，1955年3月22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71-72。

<sup>94</sup> 按此文是毛子水堅持要寫、在夏道平完稿後更親自修改，形同是少壯與老成共識，也符合刊物宗旨。〈雷震致胡適〉，1955年9月1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79-82。

<sup>95</sup> 〈雷震致胡適〉，1955年11月5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84。胡適曾稱許，陳之藩透過閱讀中英文版舊俄小說及俄共革命小說培養出反共思想，在同一時代青年中饒屬難得。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20，1959年4月29日。

<sup>96</sup> 〈胡適致雷震〉，1956年4月1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92。

<sup>97</sup> 如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頁19-20；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30期（2001年12月），頁110-121。

分說明了雙方去異求同、尋求合作的傾向。<sup>98</sup> 由於思想「求同」而尋找拿捏批評尺度，或致胡適未如1951年一般公開議論臺灣事務。

按1956年10月以後，蔣介石和胡適之間的「求同」關係開始轉變，與胡於《自由中國》「祝壽專號」撰文重提總統少管事之論有關。蔣介石多管事，立意即在反攻大陸，何能接受此論？論者指出，比較國民黨人的祝壽舉動與胡適等人的言論，後者是書生意氣和不合時宜，公開談領袖的缺點更像「自討苦吃」。<sup>99</sup> 雷震曾歸納專號要點為，要政府：（一）建立反對黨；（二）建立法治制度；（三）放寬言論尺度；（四）軍事國家化，取消軍隊黨部；（五）特務國家化；（六）教育通常化，即取消青年救國黨（團）！<sup>100</sup> 議論大致與胡適在1952-1953年所談憲政秩序、言論自由、政黨政治等自由主義者所在意的基本理念相符。「祝壽專號」植基自由民主反共基礎，針對救國團存廢等問題討論，已針對臺灣現實局勢發言，跨越原則性立場宣示，也可說是胡適自由主義理念的傳承與發揮。

雷震尚不知，胡適陸續向親近友人透露擬赴臺長居，徵詢他們的意見，期望回國能讓人「更認真對待」。胡適赴臺長居心意也與《自由中國》遭受軍方政工單位圍剿，黨方宣傳機構的關注處境是不可脫離看待的。事實上，1957年初官方系統發動「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等活動，與打擊《自由中國》，令刊物的「保護傘」胡適無法自外。<sup>101</sup> 胡顯然認知到臺灣現實政治情勢，希望盡己心力以維繫自由空間。若就胡1953年期盼讓刊物成為政府反共聯盟的立場言，其主觀期望已與客觀現實存在差距，胡適、《自由中國》和蔣介石之間的差異及對立態勢更趨明顯，刊物之言論方向也從諍諫式民主往參與實踐政治運作，最終到選舉與反對黨問題。1958年間，胡適聲援爭取言論自由，呼籲由教育界、青年和知識分子出

<sup>98</sup> 黃克武，〈1950年代胡適與蔣介石在思想上的一段交往〉，《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2011年12月），頁18。

<sup>99</sup> 陳漱渝、宋娜，《胡適與蔣介石》（武漢：武漢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43。

<sup>100</sup> 〈雷震致胡適〉，1956年10月2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98。

<sup>101</sup> 〈胡適致朱家驊函〉，1957年3月21日，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頁2578。相關敘述，參見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30期（2011年12月），頁123-124。

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也可視為觀察刊物大方向發展後予以肯定及呼應的指標之一。<sup>102</sup>

1955年底之後，雷震希望促成在野政黨團結，進而組織反對黨。他致函胡適，剖陳自己將以餘生奉獻推動民主自由，並規勸胡適「如無少數人犧牲，國事是無前途的」參與實際政治。<sup>103</sup> 他也期盼王紀五從旁勸說，說明促成民社、青年、一部分國民黨人、無黨派人士的團結組黨，一是和國民黨做政治競賽，二是維護自由民主與現有局面。<sup>104</sup> 胡適在1957年初亦聲明「毀黨救國」，抨擊在臺民社、青年二黨的無力。<sup>105</sup> 胡對於雷挾社會期待為重之勸說，先是維持沈默，刻意不回信，回信時先以四不之外的第五不——「不回信」，表示生性「疏懶」，最不適於「幹政治」；再以與張君勱、顧孟餘同在美國加州，只見過顧幾次，也不談實際政治回絕。<sup>106</sup> 對於胡適以大病初癒為由的情理表態，雷震是心中有數，仍未灰心。雷甚至是「退讓式」的寄望如《自由中國》方式之名義領導，並贊成胡返國定居；胡也沒有勸阻或斷絕與雷談論反對黨的構想等問題，甚且胡適提及「切於實際的思考」，「自己把反對黨組織起來」，<sup>107</sup> 也刺激了雷震。胡顯然以調解人及顧問立場表示意見；雷仍期待胡借名（當象徵式領袖）<sup>108</sup>，並藉此集結反對勢力、擴大社會影響力。反對黨問題與胡適提倡自由民主理念、刊物宗旨一致，雙方於情於理均不會決裂。唯胡適不願續任《自由中國》「借名」發

<sup>102</sup>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一九五〇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194-195；胡適〈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自由中國》，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1日），頁9-10。

<sup>103</sup> 〈雷震致胡適〉，1956年10月2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00-101。

<sup>104</sup> 新新聞編輯部，〈雷震書信首度公開——第一部分：民國45年2月至民國46年12月〉，《新新聞》周刊，第101期（1989年2月6-19日），頁21-22；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頁250-252。

<sup>105</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17、35，1957年1月20日、2月23日。

<sup>106</sup> 〈胡適致雷震〉，1957年8月28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15、117。

<sup>107</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165，1957年9月19日；〈胡適致雷震〉，1957年8月2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19。

<sup>108</sup> 新新聞編輯部，〈雷震書信首度公開——第一部分：民國45年2月至民國46年12月〉，頁29。

行人，又何以願「借名」當可能的反對黨領導人？與雷震有交情的成舍我、程滄波因此認定胡適「不會搞反對黨了」。<sup>109</sup>

1957年底《自由中國》因少壯派殷海光公開挑戰政府反攻大陸論及1959年「陳懷琪事件」引發訴訟案，<sup>110</sup> 胡適都曾關切並發言，也親自面臨老成與少壯派之意見差距。胡適友人毛子水坦承，約從1955年後漸因學校課務關係而「不能對雜誌幫忙」，<sup>111</sup> 但未退出刊物重大活動。毛子水減少社內活動，使殷海光下筆發言更無保留。由殷海光撰稿之〈是什麼就說什麼？〉及〈反攻大陸問題〉（屬社論系列），係戴杜衡、夏道平修改後發排，可視為少壯派和雷震取得共識，亦符合社內程序。該文出刊後，遭外間視為「反攻無望」，亦受官方媒體圍剿；國民黨方宣傳會報擬議停刊處分，經黃少谷（宣傳小組負責人）出面緩頰，以停刊反將增強《自由中國》地位方才打消。雷震獲知外間迴響，向殷海光表示「今後要寫和平些」，也獲殷同意，殷所撰回應文毫不相讓，只得以戴杜衡修改稿做為底稿。<sup>112</sup> 雷震自認「我們沒有亂，我們有一定步伐，完全為國家打算」的動機下刊登殷氏文章，<sup>113</sup> 使他與官方關係更形惡化。在〈反攻大陸問題〉風波後，《自由中國》編委諸人不欲橫生枝節。當雷震邀請剛受託寫完〈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社論（作者也自承為大膽之作）之傅正（1927-1991）擔任編輯，諸人一聽傅出身政工幹校，恐其肩負滲透工作；又恐其若與蔣經國「搞得不好」，在雜誌社工作將為社方招致麻煩，最初不予贊同，甚令傅正產生幾分人格受辱感。雷震不得不以胡適於1958年4月在臺定居後，同人將不會介意予以安慰。<sup>114</sup> 傅正

<sup>109</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172，1957年10月1日。

<sup>110</sup> 1959年初，《自由中國》刊登一篇署名「陳懷琪」的軍人投書，投書人陳懷琪後來控告社方偽造投書。3月3日、25日雷震兩度到臺北地方法院應訊。其後王雲五上書當局籲請寬大為懷，訴訟案不了了之。

<sup>111</sup> 毛子水，〈《自由中國》十週年感言〉，《自由中國》，第21卷第10期（1959年11月16日），頁5。

<sup>112</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136、145-146、148、153，1957年7月26日、8月12、13、17、25日。黃少谷的回應可視為黨用柔軟方式試圖馴服異議者，而非強制鎮壓的作法。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頁251。

<sup>113</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165，1957年9月20日。

<sup>114</sup> 潘光哲編輯，《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頁10、14、22-23、27，1958年1月17、23、31日、2月4日。

終在1958年4月中進入《自由中國》擔任編輯。此事顯示，社方人士在時勢推演之下的審慎保留態度，也更不欲招惹事端。

《自由中國》反攻大陸論風波爆發，胡適致函雷震欲索閱刊物，以明瞭事情始末。雷震知道胡適為此「急得很」。<sup>115</sup> 彼時雷震引胡適為同盟；但胡適表達關切情緒之餘，內心想法可能更為複雜。

胡適後來向《自由中國》人士表示：

「反攻大陸」是一個招牌，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徵，不但是臺灣一千萬人的希望的象徵，而且是海外幾千萬僑胞的希望的象徵，還可以說是大陸上幾萬萬同胞的希望的象徵。這樣一個無數人希望的象徵的一個招牌，我們不可以去碰的。我們要知道，凡是有希望象徵的招牌，都不應該去碰的。況且，我覺得「反攻大陸」並不是那樣的沒有希望。<sup>116</sup>

此段話既強調說話技巧與話題選擇，也與蔣介石一樣地將臺灣放在「反攻中國的跳板」地位。胡適的確關注官方宣示，在日記貼入一篇蔣介石標題反攻計畫「主義為主，武力為從」演講，其中有文字——「我們在軍事上已有足夠的準備」，「隨時可以收復任何地區」。<sup>117</sup> 若從胡對《自由中國》人士的說詞觀之，存記報導或許代表他的心思：樂見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助的反攻大陸行動。反攻大陸及反共立場，就能將胡與中華民國政府拉在一起而不致鬧翻。胡適的底線或在以維持臺灣穩定為前提，顧及自由與民主。儘管胡、蔣關係已因胡適在言詞與立場之「爭」而緊張，<sup>118</sup> 胡仍寄望維持溝通，以行規諫。這的確顯現出胡適與雷震及《自由中國》少壯派在此問題意見與實行手法之差異，各有理由與說詞堅持。

---

<sup>115</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153、157，1957年8月27日、9月3日。

<sup>116</sup> 胡適，〈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頁9。

<sup>117</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368，1958年12月24日。

<sup>118</sup> 蔣在1958年6月間決定予以「冷處理」。詳見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30期（2001年12月），頁121-129。

## 二、赴臺定居後（1958.5-1960.9）

胡適赴臺定居、擔任最高學術領導人——中央研究院院長，該扮演何種公共角色格外引人關注。雷震期盼胡適擔負政治性角色，雜誌社生力軍傅正則有不同意見，認為在政治上要胡領導反對黨更難，只能期望他以地位和聲望為學術界做些有益的工作。<sup>119</sup> 胡適赴臺後與雷震見面晤談、交換信件，針對時局觀感之對話，再度展現兩人對角色認定及行動與否之分歧。雷震表示，胡適意見「和我之間有一點距離，即我對現局認為去之亦無所謂，他是想改善。」胡也曾向全漢昇表示，雷震「是來做說客的，勸他加入政治。」全氏與學界諸友「都是反對他參加政治的」。<sup>120</sup> 胡適此語顯然是以學界友人反對為由，回絕雷挾時局發展與社會期盼之勸說。但他禮貌周到，並未斥責出身政界的雷震。雷震亦不諱言：「我過去在國民黨裡面謀求改造，今日既離開了，當然要組黨以謀改革，乃理所當然的事。」<sup>121</sup> 雷震已與執政者關係疏離，立場相異，有「投入政界」「做」改革之鮮明意願，言論在此基礎上無所忌；胡適縱因中研院院士會議致詞與蔣介石衍生示理之爭，打破營造友善氣氛的設想，<sup>122</sup> 在政治行動上仍是以諍諫為主，也顧及與蔣交情，發言不免保留。

胡適擔任總統府所屬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依舊關注《自由中國》，予以可能的協助。他確實以刊物的家長姿態與職業聲望出面，如以此觀之，外間「好熱鬧，怕麻煩」之描述，<sup>123</sup> 似不盡適用。一如1953年起，亞洲協會正式購買刊物1,000本，後增至1,500本。1957年該會高層表示希望胡適能多寫文章以示積極支

---

<sup>119</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85，1958年5月3日。

<sup>120</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401，1958年11月17日。

<sup>121</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406，1958年11月21日。

<sup>122</sup> 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頁23-24；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30期（2001年12月），頁124-127。

<sup>123</sup> 卜少夫，〈雷震被捕前前後後（下）〉，《新聞天地》（香港），第659期（1960年10月1日），頁5。

持，加強對海外宣傳的影響力。<sup>124</sup> 翌年該會在臺人士突然表示：因為中國政府一再抗議亞洲協會支持批評政府之刊物，雜誌購書費亦可能發生問題，協會不希望遭到印尼政府驅趕事件在臺灣重演。雷震以刊物不只談政治，還是文化工作，對政府的批評亦無不是等由回應協會。政府抗議意謂其視《自由中國》為敵，<sup>125</sup> 是故雷震有警覺地去電人在美國的胡適，委請其和亞洲協會人士就近會談以維持補助。當協會人士稱中國政府抗議《自由中國》文章刺激時，胡回應政府對雷君亦有刺激，最後表示補助與否係由該會決定，但其意見「還是補助好」。<sup>126</sup> 胡適本可不理此事，卻因他身處臺灣、體認到政局發展現況、對刊物的一貫支持及同情態度，使他出面說話。此舉再度確認胡適、雷震、《自由中國》之間的同盟關係。

1959年初因陳懷琪訴訟案，令雷震加重失眠症狀；同一時間，執政當局向自由派學人、教育部長梅貽琦示好。<sup>127</sup> 雷震為陳案訴訟耗費心力，也準備一旦入獄，以少壯派夏道平、殷海光、戴杜衡為中心維持社務運作，也和胡適、王世杰、許孝炎、王雲五等人談話。<sup>128</sup> 胡適理解到《自由中國》能夠在困境中維持10年，雷震（辦雜誌變成政治異議者）和一班朋友的努力，與讀者的支持是關鍵，不能因此事毀掉自由中國言論自由象徵。他以「公開打自家小孩」的自責姿

---

<sup>124</sup> 參見馬之驢，《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頁116-119；新新聞編輯部，〈雷震書信首度公開——第一部分：民國45年2月至民國46年12月〉，頁23-24。

<sup>125</sup> 研究者根據資料指出，官方至遲自1958年4月1日起由國民黨中央第六組邀集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內政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等從政主管成立《自由中國》雜誌審查小組，每月召開兩次審查會議，研析刊物不妥言論，並彙集成冊分送有關單位研議對策參考。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頁252。

<sup>126</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390、391、394-395，1958年10月28、30日，11月6日。11月21日，雷震、胡適與亞洲協會Sullison談話內容仍不脫6日日記所載內容。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9冊，頁405，1958年11月21日。

<sup>127</sup> 〈雷震致胡適〉，1959年4月16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73。1959年2月7日，總統以年節為由，餽助梅氏15,000元，由張群秘書長派人交送。同年中，梅氏受邀參加軍校畢業典禮，亦由蔣經國出面迎接以示禮遇。楊儒賓、陳華主編，《梅貽琦日記（二）：1958-196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2、158，1959年2月7日、6月16日。

<sup>128</sup> 相關記載詳見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40冊，頁37-58，1959年2月28日至3月28日。



態要求《自由中國》必須注重編輯技術，包括取消可能引起爭議的短評，要求對於投書應該正反面意見俱陳，以示公平，社方人員必須「幽默」有大肚量；在刊登技術上，編輯必須「有常識」判斷力，標題用字必須審慎。<sup>129</sup> 胡適一向不以社中前輩與前創辦人自居，竟然對內表態且強調刊物編輯原則與具體方針，自是特殊，或可解讀為胡適認定外間情勢嚴峻，不容輕忽以對。

只是胡適並未料到，家長式的表白並不管用。雷震為了堅持大原則，向王世杰表白不願讓步。3月5日，胡適特別再去函「以編輯委員會的一個分子的資格」說話，要求必須檢討編輯方法，並提出3點編輯方針建議。收信者雷震也以官式口氣回應，將和刊物同人討論胡先生的「訓示」，一併懇請胡完稿具有實質「支持」作用的〈容忍與自由〉一文。雷震亦促請胡適和出面協調的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電話溝通。<sup>130</sup> 胡適為了自承「並不好寫」的文章，習慣利用晚上工作的他更「費了好幾個晚上的工夫」才完稿，稿件刊出幾天之後恰巧生病，病前正準備致函雷震。<sup>131</sup> 3月10日，梁實秋送來〈談話的藝術〉，以示支持刊物，該文與胡適文章於同期（第20卷第6期，1959年3月16日）刊登。<sup>132</sup> 胡適應感受到《自由中國》同人支持雷震的態度，否則無須展現難得一見的強勢姿態，堅持發表信函，並表示刊物要對投書「有辦法」；此舉亦希望執政者真把他「當回事」，以放過《自由中國》。唯監察委員宋英亦對胡適「自動示弱」之舉不表贊成，謂雷震「寧可坐牢，亦不應發表（筆者按：胡適信文）。」雷震雖尊重胡適意願發表信文，也不得不和態度強硬的戴杜衡與殷海光溝通，盼得諒解。雷震的心境或可用俗諺「打落牙齒和血吞」形容。稍後刊物表示，短評於5月起取消，

<sup>129</sup> 〈胡適致雷震〉，1959年2月1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62。讀到文章的陳啟天立即指出，胡「用自責之口吻為《自由中國》講話，他心裡很難過，顯然就是讀到重點。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51，1959年3月17日。

<sup>130</sup> 〈胡適致雷震〉，1959年3月5日、〈雷震致胡適〉，1959年3月7日、〈雷震致胡適〉，1959年3月27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65-6、167、171。胡適約從1910年起關注容忍，1941年起入文，談論以批評政府及防範政府的錯誤行為為主的政治批評。Chen-te Yang（楊貞德），“Hu Shih, Pragmat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Dissertation, 1993), pp. 287-288.

<sup>131</sup>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12；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53，1959年3月20日。

<sup>132</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47，1959年3月10日。梁實秋，〈談話的藝術〉，《自由中國》，第20卷第6期（1959年3月16日），頁24。

社論仍照臺灣通例不署名，實是宣示刊物之底線。幾月之後，胡適在美更特別函寄美國處理讀者投書方式供雷震等人參考，後者以國情不同回應，仍放軟口氣表示「以後當認真處理」。<sup>133</sup> 上述均顯示兩方意見差異。雷震理解胡適的態度與立場（或許在他人眼裡看來會近似崇拜而有所迴護<sup>134</sup>），也以社長身分盡力調解社內意見，仍不多作讓步。胡在 4 月生病住院期間，仍關切案件之最新發展，再度表示「胡適主義在禱告，希望常識使他們清醒過來。」<sup>135</sup> 雷震兩度出庭，再經王雲五建言，陳案訴訟最後不了了之。胡之反應並非表面功夫或應酬，是真心與充滿感嘆之意，足見其關懷之切，力圖發揮「保護傘」作用。但從《自由中國》少壯派人士對胡適信函感受可知，他們對於向當局讓步（甚至屈服）的論點是不以為然的。

在此背景與心理之下，殷海光對〈容忍與自由〉的回應呈現社內之不同見解，值得注意。《自由中國》同一期發表殷、毛各自回應，毛呼應胡適意見，和胡為同盟；殷海光意見不同，指出容忍問題有其總體意義，也值得細讀深思，唯「容忍的態度是否能夠很容易地在每個人道德意識與心理中產生？」、「容忍產生的難易，是否與容忍所處的環境有很大關係？」因此容忍應該多向統治者和有權有勢的人講，「同樣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易，有權有勢的人難，……自古而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sup>136</sup> 胡適最後利用公開場合回應殷海光說：「拿筆桿子的人」也是有權有勢的人。是否自己真做到「對人無成見，對事有是非？」他私下更在日記浮貼毛文加圈字句：正當的倡導輿論的刊物，一方面固應督促政府作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改革，一方面亦需支持政府良善的計畫以增加政治的效率。尤其在當前時刻，主持言論者要處處「務其大者遠

---

<sup>133</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56、58、60、66，1959年3月26、28、30日、4月11日；〈胡適致雷震〉，1959年7月、〈雷震致胡適〉，1959年7月29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195、197。

<sup>134</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172，1959年1月30日。

<sup>135</sup> 「他們」自是指執政者及扈從。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76，1959年4月27日。

<sup>136</sup> 毛子水，〈容忍與自由讀後〉，〈自由中國〉，第20卷第7期（1959年4月1日），頁14；殷海光，〈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自由中國〉，第20卷第7期（1959年4月1日），頁16。

者」，要處處「綜核名實」。<sup>137</sup> 胡適顯盼少壯派的殷海光、和少壯派站在一起的雷震、統治者三方各退一步，「支持政府」與「改革」二者缺一不可，以求維繫《自由中國》（以及背後象徵的臺灣言論自由）。胡適指出「說話的技巧」的重要，及包容、支持政權的必要，自與從抗戰以後他和當局互動關係友善，並願支持政府反共、在美接受當局生活資助等因有關。<sup>138</sup> 此是委託胡適說話的雷震所能理解的。<sup>139</sup> 這也是學術行政最高領導人胡適所能說的話。

胡適特別談到《自由中國》同人能否給陶希聖在刊物發言的空間？陶希聖曾為胡適友人。研究者指出：陶希聖已是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領袖文宣智囊，主張採取鎮壓異議刊物。1959年陳懷琪事件期間，陶曾上簽呈建議蔣介石應藉陳案進行司法懲處，使雷震知所收斂。陶與雷之間僅透過中間人阮毅成傳話，諸舉動顯示決策者對《自由中國》異議媒體之強勢不妥協態度。<sup>140</sup> 當執政一方公然視《自由中國》為敵、挾可受控制之媒體與相關體系予以「圍剿」，《自由中國》如何營造與定位對話空間？胡適特別舉出陶氏，顯具用意。如放在20世紀中國政治往往是由「贏者全拿」、「勝者為王」主宰，參與者多無意妥協言，<sup>141</sup> 胡適意欲執政者與刊物超越內部二元對立的格局，雙方共同努力維護自由世界，集中精力對抗自由世界的真正敵人——共產陣營。如此，為何不從刊物做起，營造開放空間？一方面亦是他期盼《自由中國》脫離內部對抗格局，建立更為開闊的思想系統用意。就長遠看，有其道理，可視為胡適對眾人之提醒及規勸。也有學者指出，這一系列論述是有助加強輿論界爭自由的道義力量，與對國民黨政權較量時的人格力量。<sup>142</sup> 唯《自由中國》持續關懷臺灣現實政情發展，成為民間在野

<sup>137</sup> 胡適講，楊欣泉記，〈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講詞〉，《自由中國》，第21卷第11期（1959年12月1日），頁8；毛子水，〈《自由中國》十周年感言〉，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465。

<sup>138</sup> 楊金榮，〈角色與命運：晚年胡適的自由主義困境〉，頁284-285；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30期（2001年12月），頁116-121。

<sup>139</sup> 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頁245。

<sup>140</sup>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頁254-255。

<sup>141</sup> 鄒儻，〈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60-261。

<sup>142</sup> 胡明，〈胡適傳論〉，下冊，頁1104。

者見到異議之聲管道之際，<sup>143</sup> 執政者視之為敵，光靠刊物營造開放空間有其現實困難。刊物同人也難理解胡適的用心。

殷海光早與當局關係疏離、面對統治機構鎮壓依舊堅持為言論前鋒。他清楚體認到，批評時政謀求改進臺灣政治現實的讀書人與手握軍權的統治者終究是不對等的，胡適所言「拿筆桿子的人」也有權勢並非現實。與其問讀書人支持政權與否，更要看政權是否真正實行民主？而非假反共之名犧牲民主及鎮壓異議者。在殷海光的思路中，擁護蔣介石反共、與其同盟並非唯一選項，這點和雷震所思不謀而合，卻迥異於胡適所選擇的包容。異議者一旦面臨統治者藉機壓制（如陳懷琪事件），要退讓或繼續為文，事涉《自由中國》之生存與創立根由，毫無迴避與退讓空間。胡適單方面要求異議者退讓、訴諸統治者個人理性接受容忍是不夠的，如何建立使統治者無法濫權的政治機制、使統治者不得不容忍異議者更為關鍵的解決之道。《自由中國》針對臺灣現實情勢立言立說，才是自由主義與民主真實在臺灣立足生根及發展之道，更是殷針對臺灣政治現實所深切期許者。胡、殷雙方處於不同層次與立場的回應終究無法說服彼此。儘管雙方都追求及努力維繫臺灣的言論自由，但所居地位與立場，以及出發想法差異，造成立場涇渭分明。殷海光生前不滿胡適「與現實政治權勢糾纏不清，所以難免作權勢的工具」；與胡適私人接觸時「內心立刻產生二人相距千里之感」。<sup>144</sup> 這類言詞既呈現殷氏求全之心，及察覺胡適基於反共立場和蔣介石形成同盟關係，適足令胡處於現實困境。胡適若維持蔣——胡反共同盟、聲明支持政權，難保不會犧牲堅持在臺灣宣揚與落實民主自由的《自由中國》，這就是「思想清晰」的殷海光觀察與憂心之處。畢竟，胡適的現實困境是一度閒居國外，好不容易為自由學者保住他們學術事業唯一堡壘之中央研究院，<sup>145</sup> 內外環境與友朋人情羈絆，讓他難以與統治當局對立。

《自由中國》另一種不同意見，可以傅正為例。傅以自身「正為民主中國而

---

<sup>143</sup> 臺中的何春木提及所謂「民主人士聯誼會」，定期購讀《自由中國》等刊物，相互聯繫、交流意見，以如何團結一致對抗國民黨，或如何應付國民黨作票手法為討論主題即可為例。林良哲編著，《何春木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年），頁182。

<sup>144</sup> 殷海光，〈殷海光致何友暉函二封〉，《明報月刊》，第47期（1969年11月），頁82。

<sup>145</sup>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頁145。

奮鬥為大幸了」，<sup>146</sup> 針對胡適所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寫了一篇自認婉轉的反駁，由雷震、戴杜衡、夏道平幾人看過。夏表示：傳文寫得「婉轉迴旋，從反面說到正面，也不像由衷的贊成，總覺得有點彆扭。」<sup>147</sup> 夏認為，若要寫反駁文章就持明確立場，不要畏懼得罪人，即便對方是胡適也一樣。以夏下筆慎重而表述重立場清晰，他寫給傳正的字條既合乎一貫態度，也微妙地表現他不迴護任何一方之態度。傅思慮再三撤稿，以不刊登收場。傅正撤稿是因為自己無法講清楚，並不代表他同意胡適所言。

1960年間，胡適持續以家長態勢關切《自由中國》反蔣介石修憲三連任相關言論。在輿論界幾乎無人敢說反對話語之際，《自由中國》是少數敢言者。傅正自承，敢下筆是因為「我們仍不能不憑藉自己的良知和良心，提出一些反對的意見。」「像這樣重大的問題，如果大家都不敢表示意見，將是我們今天在臺灣號稱為民主自由而奮鬥人士的共同恥辱。」<sup>148</sup> 3月1日（總統選舉日前）出刊的雜誌共印21,000份，為「祝壽專號」以後銷售最高紀錄。8日，胡適送交〈赫爾回憶錄序〉稿及短信一封，勸刊物下一期文字要特別小心，並附上兩封假名信件（影射雷震為共黨操縱棋卒，勸胡勿和雷震在一起）。編輯傅正認為「難怪胡先生看了這種信，要為我們擔心了！」他解讀為統治機制耍「流氓手段」，要多所提防。<sup>149</sup> 這段時間，胡適再度提醒雷震「殺君馬者道旁兒」，<sup>150</sup> 足見他希望刊物審慎行事，避免後者發文火上加油，加深與執政者間之對立。國民大會為選舉總統開會期間，胡適因病入院，仍出院投票；胡適、梅貽琦依禮簽名致賀蔣介石當選，投票舉動讓雷震也認為「有點投機取巧」。<sup>151</sup> 事後，王世憲（張君勱妹婿）表示，外間傳言當局有意懲處雷震，雷震「聞之泰然，我（雷震）未做錯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胡秋原也說，胡適出院投票是為了《自由中國》。胡適且不止一次表示，外間對雷震「太不好」，雷所處環境「太惡劣」。對於外間

<sup>146</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190-191。1959年12月7日。

<sup>147</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194，1959年12月12日。

<sup>148</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211、232，1960年1月7日、2月9日。

<sup>149</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254-255，1960年3月8日。

<sup>150</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268，1960年3月18日。巧合的是此語羅家倫曾向胡提及。

<sup>151</sup> 雷震，《雷震回憶錄》（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1978年），頁77。

散布不利於他的各類訊息，雷震將矛頭指向陶希聖。<sup>152</sup> 由上述顯示，胡適最不樂見國民黨公然將雷震和寇讎中共連上關係製造對立。胡適認為對立情勢是國民黨與執政者負較大責任。胡適有這番體認，與定居國內親身聽聞感受有關，胡甚至要雷勿將信送到中研院和平東路辦事處。<sup>153</sup> 即便如此，胡適並未主動斷絕和蔣介石溝通，也未如雷震期盼地領導組黨。在統治者眼裡，胡適、雷震就是同一路人，蔣介石要陳誠轉告胡適、王世杰，再由之告訴雷震，行政院長仍是陳誠，「叫他們不要鬧了」。雷震解讀為，統治者認為他們之所以反修憲連任，只為陳誠，是「可笑之至」。<sup>154</sup> 上述顯示，針對高層將雷、胡視為同路人，雷震倒有幾分引以為傲。

胡適對臺灣政局現狀感到失望，但於南韓政局演變、統治者下臺感到振奮。他認為南韓李承晚總統下臺，與受尊敬的大學教授150人上街遊行有關，「臺灣如何」？王世杰勸告雷震，韓國事件對東南亞影響大，暫時不要講話，「以免遭批幸災樂禍」。<sup>155</sup> 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平常對記者健談、誠懇作答，有關韓國的動亂卻也不願對事件的本身作任何評論，以「對這次韓國所發生的問題，未作深入的研究……」一語帶過，<sup>156</sup> 就知以王、蔣的政治敏感度察覺韓國事件造成臺灣政治高層心理壓力。王、胡清晰感受到執政當局對雷震與刊物的敵視氣氛與對亞洲局勢變化的緊張，要雷震謹慎因應。胡為南韓的大學教授公開力挺異議者訴求而振奮，與臺灣現實之黯然成為對照。或許傅正評價韓國政潮對臺灣政界之衝擊是精準的：「對於在朝者，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對於在野者，則是一次有力的鼓勵。」<sup>157</sup> 5月16日，《自由中國》針對韓國政情登載殷海光執筆社論〈「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與傅正執筆〈評《工商日報》對南韓政治風暴

<sup>152</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286，1960年4月7日。

<sup>153</sup> 此舉顯欲避人耳目與監控。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284，1960年4月4日。

<sup>154</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284-285，1960年4月5日。陳、胡有長期科學指導委員會的公務聯繫；王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與雷公私交誼已久。

<sup>155</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298，1960年4月29日。王世杰在1960年初即曾勸胡適勿公開針對修憲議題發言公開反對（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359，1960年2月11日），此時勸告雷震顯亦同樣用意。

<sup>156</sup> 于衡，〈蔣廷黻談天下事〉，《聯合報》，1960年5月1日，版2。

<sup>157</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306，1960年4月28日。

的看法〉專論，外間認為文章「太厲害」，雷妻宋英更捏把冷汗。雷震無懼道：「國民黨有六十萬大軍、特務警察和無數報刊，還怕什麼？」<sup>158</sup>

隨著《自由中國》檢討與批評臺灣現實政局益發激烈，檢討臺灣地方自治實施現狀正好成為知識分子與臺灣人士共同焦點。雙方認為，解決地方自治，以及在臺灣落實真正的自由民主，就是依靠反對黨。反對黨成為質疑黨國體制合法性的利器。一方面，從1957年起，「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的結尾篇討論反對黨問題，朱養民亦撰寫系列有關反對黨文章，都強調反對黨在體制中之必要性。另一方面，臺灣地方人士在《自由中國》表達自身投入地方自治選舉經驗，也讓刊物、雷震和臺灣地方選舉活動的關聯益發密切。<sup>159</sup> 二者相結合讓反對黨有機會在臺灣政治成真，不再為空中樓閣。

雷震雖關注反對黨議題，與臺籍人士維持一定聯繫，體認臺灣從二二八事件與政府鎮壓以後顯著的族群問題，卻憂懼「地方主義」的產生。在1958年5、6月間，雷震曾向胡適表達「不可有地方主義」的想法。該年8月也憂慮申請成立的地方自治研究會「地方色彩太重」。<sup>160</sup> 到1960年間，蔣介石修改憲法臨時條款得以連任總統，不受憲法規定限制，個人威權統治業已鞏固。雷震問胡適，今後該怎麼辦？胡表示，由民、青兩黨和國民黨民主派和臺灣人合組反對黨，若真能組成會表示贊成，但不會參加，以維持獨立地位。<sup>161</sup> 比起1940年代後期，胡適主張分化國民黨為二至三個團體、1958年中所提「知識分子為基礎的新政黨」，<sup>162</sup> 彼時所言更為貼近臺灣政治現實。稍後，胡適再度提點雷震：「要組織反對黨，必須先聯絡臺灣的地方人士。」這點也和傅正所構想方向之一相符合。<sup>163</sup> 由前述可知，胡適正式行動往往與私人言談意見有差距。胡適在政治公

<sup>158</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308，1960年5月16日。

<sup>159</sup> 有關《自由中國》民主想像問題與反對黨的聯繫問題，潘光哲近作有所討論。潘光哲，〈形塑「黨國體制」與「民主經驗」的記憶文化〉，特別是頁622-638的討論。

<sup>160</sup> 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頁259-261。

<sup>161</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270，1960年3月16日。

<sup>162</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頁356，1948年4月8日；胡適，〈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頁10。

<sup>163</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298，1960年4月20日。5月25日，胡適再向雷震與夏濤聲重申，新黨必須與臺灣人在一起才会有力量之意。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315，1960年5月25日。

開言論與行動，往往謹慎再三，甚且可能踟躕不前；一旦私下與親近者議論時事，胡適就敢言無忌。胡適提點後，《自由中國》刊登雷震的〈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正式將反對黨的著力點與發展空間擺在即將舉行的臺灣地方選舉，號召對象包括信仰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人士（包含臺灣人）。<sup>164</sup> 這也開啟超越臺灣族群界線，共同合作解決現有政治問題之空間。

胡適如同3月所言，關心新黨組織問題，於5月25日下午向雷震表示「不和臺灣人在一起，在新黨不會有力量」。同日晚間雷震邀約選舉改進座談會（簡稱選改會）主席團成員的飯局，胡適亦到場致賀，多所勗勉。6月3日，胡適未回絕夏濤聲提出任顧問委員之邀請。6月11日，高玉樹草山住處舉辦飯局，胡適表示不贊成選改會成員，一旦國民黨拒絕在野黨派管理員監察，即於縣市議員選舉棄選並鼓勵選民罷選之議論，眾人亦願刪除。隨即表示聲明稿「太消極」，引起夏濤聲辯解，令胡不快離去。7月2日，胡適接受選改會召集人高玉樹、李萬居等人邀宴，表示「新黨要有容忍精神」，第一次聲明書有罵人之意，現在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罵人做號召不是上策，要腳踏實地的自己工作下去。」<sup>165</sup> 7月9日，胡適即赴美開會。1960年8月間，胡托錢思亮帶信給雷震，表示他在會議時表示聲明太消極，是比較客氣的說法，真正的意思是「太帶有批評性，太刺激了一點。」他再度明言，新黨組織萬勿等候他返國發布宣言。<sup>166</sup> 胡適此言既表示維持獨立地位之意，也呈現對於組織新黨前途不盡樂觀之觀感，但胡與新黨、雷震之理念同盟關係確立不移。

胡適並不希望新黨費心指責國民黨及領導者不是，更重要的是在「腳踏實地」作下去。他重申「寬容」，並於美國致函雷震，顯然也是表明心意，不欲新

<sup>164</sup> 雷震，〈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自由中國》，第22卷第10期（1960年5月16日），頁9-10。

<sup>165</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316、321、327、340，1960年5月25日、6月3日、6月11日、7月2日。微妙的是，在胡頌平6月3日記述表示，雷、夏、胡三人在南港會面時，胡並不支持組反對黨，也不認為會有結果，但「也只能任他們去了」。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76，1960年6月3日。此一未記談話內容寫法，為金承藝批語質疑。郭存孝，〈胡適與門人金承藝〉，《傳記文學》，第100卷第3期（2012年3月），頁94。

<sup>166</sup> 〈胡適致雷震〉，1960年8月4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235-236；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330，1960年8月22日。



黨與國民黨關係決裂，危及維繫民主自由、反攻大陸的總目標。由此可見，胡適所謂組黨人士與他的想法、看法、做法都不同，胡、雷之間亦會如此之意。<sup>167</sup> 此言仍不足顯示所謂胡適反對組黨運動與臺灣人聯繫之論。<sup>168</sup> 胡適此言此舉也無助舒緩執政者對《自由中國》與組織新黨運動結合之敵視。

胡適友人群、《自由中國》相關者多身處文教界或政界，無人實際參與新政黨籌組；刊物同仁僅少壯派傅正隨雷震巡迴全省活動。傅正心知肚明：臺灣現實政治環境不宜於從事合法的組黨活動，本身各種條件也不太健全，一搏之因在於有利的世界潮流、臺灣民心，「只要我們能堅決奮鬥，用最大的努力來推動這一工作，我們還是有成功的希望。」<sup>169</sup> 雷震等參與組黨人士以具體行動嘗試改變臺灣統治者不受權力制衡的現狀、落實自由理念，在臺灣政治史上自有重大意義。殷海光也關心實際政治活動。他認為成立反對黨是為維護基本人權，改進地方選舉，就是實現基本人權的作法之一。在具體工作方針上，除改進基層選舉外，也要刷新宣傳機構、爭取國際同情、爭取國民黨人同情等。在基本態度中，要就事論事、不爭權奪利、不弄陰謀詭計、不崇尚暴力、破除地域成見。<sup>170</sup> 殷氏和胡適所言相近，前者更坦承「外省人應該稍微反省」臺灣既存族群問題，應主動負起「解鈴」責任。他提到抹除省籍人為界線，一起組黨，臺灣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方得成功。<sup>171</sup> 這呼應胡適所言「聯絡地方人士」，更直接將共同組黨上升到維護臺灣民主自由人權層次，及具備破除省籍情結的意義。一篇社論也提到統治集團操作省籍意識，「不僅自己懷有這種變態的恐懼心理，而且還故意危言聳聽，在大陸人當中散布這種心理。」事實上，自由中國的政府不屬一黨一派，政治「只有反極權、反奴役之爭，而沒有地域觀念之爭。」<sup>172</sup> 夏道平、殷海光兩人並未實際參政，卻明確支持臺灣人與外省人共同組織新黨，致力爭取民

<sup>167</sup> 〈胡適致雷震〉，1960年8月4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236。

<sup>168</sup> 楊金榮，《角色與命運：晚年胡適的自由主義困境》，頁285。

<sup>169</sup>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頁334，1960年8月24日。

<sup>170</sup> 詳見殷海光，〈我對在野黨的基本認識〉，《自由中國》，第23卷第2期（1960年7月16日），頁39-43。

<sup>171</sup> 殷海光，〈我對在野黨的基本認識〉，《自由中國》，第23卷第2期（1960年7月16日），頁44。

<sup>172</sup> 〈社論：臺灣人與大陸人〉，《自由中國》，第23卷第2期（1960年7月16日），頁4。

主自由人權運動之成功，且認為是破除省籍情結最好的解藥。破除族群界線，也確實反映在組織新黨運動中的人事組成，以臺籍高玉樹、李萬居、浙江籍雷震為核心發言人即為一例。

只是，執政者的最大恐懼就是喪失執政權。《自由中國》一篇社論提及，政治性的假話是支持現存政治的觀念基礎。「權勢核心愛的是乖順的人群」。彼時臺灣的人感受到說真話會有危險，就順應官方製造的假話以求免禍。<sup>173</sup> 這申明了《自由中國》是少數敢、也願意說真話之媒體，和統治機制對立已成事實。因此，統治者透過黨政宣傳媒體既扣籌組中的新政黨以分裂政府與人民感情，也扣《自由中國》假言論自由之名行誹謗攻擊之實、煽動人民流血反抗政府等帽子。在雷震、傅正等人於1960年9月4日遭到警備總部拘捕，官方以「知匪不報」起訴雷震，官方報刊《中華日報》社論更支持司法與行政當局「當機立斷」。<sup>174</sup> 卜少夫曾經口誅筆伐《自由中國》，也因此種社論表示，於雷案發生有「意外與不意外」觀感。<sup>175</sup>

面對刊物骨幹雷震等人遭到拘捕，《自由中國》或續或絕？胡適第一反應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sup>176</sup> 這位前「發行人」還想做點事。他於回覆陳誠電文即明說預言之：「《自由中國》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之惡名。……雷儼寰愛國反共，適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騰笑世界。」9月6日，胡適重申，盼望政府以司法審判雷震等人，希望陳誠能透過陳雪屏邀請毛子水一談《自由中國》史事。<sup>177</sup> 9月21日，胡適在紐約受訪，仍表示

<sup>173</sup> 〈社論：我們要有說真話的自由〉，《自由中國》，第23卷第2期（1960年7月16日），頁5。

<sup>174</sup> 〈揭發自由中國乖謬言論〉，《中華日報》，1960年9月4日，版2，轉引自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49年（1960）7至12月》（臺北：國史館，1990年），頁351-352。

<sup>175</sup> 卜少夫，〈雷震被捕前前後後（一）〉，《新聞天地》，第658期（1960年9月24日），頁4。1960年下半年，《新聞天地》發行人卜少夫尋求貸款，致函陶希聖請求臺灣銀行信用貸款50萬元，分五年予以償還，由陶氏出面函請行政院秘書長陳雪屏、臺灣省政府主席周至柔核辦。〈中國國民黨第八屆248次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宣傳指導委員會第11次綜合小組會議重要決定事項〉，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會8.3/500。

<sup>176</sup> 白吉庵，《胡適傳》，頁488；胡明，《胡適傳論》，下冊，頁1119。

<sup>177</sup> 胡頌平編輯，《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9冊，頁3335、3336，1960年9月4、6日。

「個人也沒有覺得它（按：《自由中國》言論）有什麼激烈的地方，不過這份半月刊言論自由的爭取，雷先生確盡了最大努力去做。事到如今，我仍舊覺得在『反共』與『愛國』這一點上，他並沒有做錯什麼。」<sup>178</sup> 胡適不同意官方立場，以一系列說明與人格保證，明指《自由中國》堅持反共與愛國立場。他清楚表示，辦了雷震，一定會迫使刊物停刊；政府將背上「摧殘言論自由」之名，宜三思。毛子水的立場，應與他之前講詞「偶有過於偏激的言詞，恐怕都是因為執筆的人蒿目時艱、傷心國難而遂踰矩的。這不能說不是毛病。但就一個民主國家而言，這樣一種刊物，究竟是不能沒有的。」<sup>179</sup> 是相去不遠的。

胡適在海外期間，依舊和政界人士接觸，以聽取各方說法及意見。王世杰力勸胡適返臺「不可改變其二年來之一貫態度」，意在勸胡勿與政府決裂，但胡不同意王言「不公開批評」，令王感到意外。胡適返臺途經東京，毛子水特別前赴東京相會，胡也與毛及駐日使館人員共餐。羅家倫以雷震案事件人物之一的劉子英為國史館人事主任，更顯緊張戒慎。胡適對外表示，只有全體編輯委員能夠決定刊物未來。如果要繼續出版，也應該在臺灣，而非海外。如果不再出版，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有此下場，也不失為光榮。<sup>180</sup> 胡適再度揭示《自由中國》意義，如果所謂「自由中國」在臺灣實際上不再是「自由的」，亦需以《自由中國》結束作為「不說話的自由」之存在標竿。

胡適並未如外間預期地公開與官方決裂。他對雷震遭到軍法審訊判刑，難過掙扎之心情溢於言表。11月23日晚，胡適獲悉軍法覆判結果仍維持「知匪不報」罪10年刑期，他想不出任何一句話安慰雷妻宋英。當他為來訪記者示範「過五關」遊戲玩法第一次失敗，脫口而出「這真是跟雷震一樣的倒楣」。<sup>181</sup> 這流露

<sup>178</sup> 胡頌平編輯，《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9冊，頁3337，1960年9月21日。

<sup>179</sup> 毛子水，〈《自由中國》十週年感言〉，頁5。

<sup>180</sup> 王世杰姪兒王德芳於雷案爆發後，遭警總訊問後飭回。王、羅之戒慎小心，或顯示官方震懾是收到效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6冊，頁409-410、413-414，1960年9月17、10月13日；簡笙簧口述，田南萍、洪宜嬪記錄整理，〈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國史館館訊》，第3期（2009年12月），頁193；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663-664，1960年10月19、20日；胡頌平編輯，《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9冊，頁3342-3343，1960年10月22日。

<sup>181</sup> 胡頌平編輯，《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9冊，頁3384-3385，1960年11月23日。

他低落、焦慮情緒與無力感。因為官方以「匪案」為藉口，達到整肅異議者、阻絕異議言論目的，執政者權力已無法制衡，且傷害了自由、人權，胡適竟然是莫可奈何。12月22日，胡適向秘書胡頌平談起氣度與憂慮，沉吟一陣後表示：「我也不能完全做到。如果我沒有憂慮，我不會有心臟病，也不會有十二指腸潰瘍的毛病了。」12月23日，胡適又有意無意地說：「聽慣誇獎的話的人是不會接受人家批評的。正像某先生只喜歡聽人的恭維，不聽我們的話是一樣的。」他就是會在人家宴飲時說出不中聽話語的人。<sup>182</sup> 胡適的憂慮與無力感何在已不言可喻。

胡適亦參與連署「客氣的請求」蔣總統特赦雷震，<sup>183</sup> 仍未發揮作用。他只能以詩寄情，書寫楊萬里〈桂源鋪〉詩「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予雷震。<sup>184</sup> 此詩既呼應於《自由中國》最後一篇社論標題〈大江東流擋不住〉，也是安慰雷震與自己堅信之民主政治理念終將實現。胡適真意與營救雷震言論由於多屬私下，未見公開，外人眼中即易視為軟弱或是鄉愿，周棄子詩句之「途窮未必官能棄，棋敗何曾卒向前」<sup>185</sup> 即見一斑。至於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在雷震案發生後發表報紙公開聲明，宣稱在《自由中國》登出之文章文責自負。雷震判刑後，幾位編輯委員見面欲哭無淚，殷海光緊鎖眉頭，一言不發。殷海光最後雖和大家共同到南港探訪胡適，仍是一言不發。<sup>186</sup> 兩相對照，雙方公開言行差異與社會期許悲劇英雄形象，再度展現幾年來言行之差異。

## 伍、結論

胡適作為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具有重要象徵地位與意義。《自由中國》之創立是為集結愛好自由的反共者，為加強號召力，將人在美國、與蔣介

<sup>182</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99、100，1960年12月22、23日。

<sup>183</sup> 胡頌平編輯，《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頁3437，1961年1月12日。

<sup>184</sup> 胡頌平編輯，《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頁3677，1961年7月27日。胡明指出，這是一種悲涼的慰藉。胡明，《胡適傳論》，下冊，頁1119。

<sup>185</sup> 周棄子詩轉引自聶華苓，《三生影像》，頁176；白吉庵，《胡適傳》，頁496；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頁395。

<sup>186</sup> 聶華苓，《三生影像》，頁196。

石以道義支持的胡適冠上「發行人」、以其文稿充作正式成立宗旨，都是可以理解的。此舉卻讓胡適批評為「作偽」，也終以名實不符為由，堅持辭卸發行人。此舉僅只是想貫徹自己「名實相符」的意念，並不代表他與刊物關係與理念就此分道揚鑣。胡適為刊物所撰文章專為《自由中國》所作有限，刊物予以刊登是欲揭示胡適作為自由反共思想精神領袖意義。刊物中人尊重胡適，內部也存在未告解決的少壯與老成之爭。

1953年後，胡適是刊物的「顧問與調解人」，他在刊物發表的文章帶有支持刊物，突顯其為臺灣言論自由象徵之意義。隨著雷震脫離國民黨成為民間人士，仍與蔣維持一定互動的胡適便希望調解刊物與執政者之間漸趨鮮明之歧異。他確實以刊物的家長姿態與職業聲望出面，協助刊物解決問題，所以難以論斷他與刊物關係疏離。陳懷琪事件、容忍與自由相關問題顯示胡適與雷震、殷海光之間的意見與行動差異，自與前者公職在身、受統治者人情羈絆，後二者已與統治者分途而無人情羈絆，不以支持蔣介石作為反共唯一選項，移向民主反共、期盼透過改革以落實臺灣自由民主等方向有關。殷海光也因此不滿胡適與當政者的糾纏不清。在政治理念上，胡適反對總統修憲三連任、反對黨組織之關切與即時反應，和《自由中國》態度一致。但胡適幾次向雷震表態不願意參政、擔任反對黨領袖，新黨組織過程中也表示期盼新黨腳踏實地作下去，並重申寬容之重要，並不欲新黨與國民黨關係決裂，危及維繫民主自由、反攻大陸的總目標。正是因為胡適惦記反攻大陸與維繫臺灣安全，雖曾嘗試營救雷震，多屬幕後作為，也無法改變雷震受到軍法審判入獄10年的結果，反觀殷海光無畏權勢公然表態，兩人的形象、思想與行動差異也就此呈現。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與史料彙編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會8.3/500，〈中國國民黨第八屆248次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殷海光、夏君璐著，殷文麗編錄，《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楊儒賓、陳華主編，《梅貽琦日記（二）：1958-196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9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年。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1991年。

黃炎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

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潘光哲編輯，《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 二、年鑑、辭典

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2005年。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49年（1960）7至12月》。臺

北：國史館，1990年。

###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林良哲編著，《何春木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年。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胡頌平編輯，《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陳獨秀，《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廣州：自由中國社出版部，1949年。

雷震，《雷震回憶錄》。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1978年。

聶華苓，《三生影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羅榮渠，《北大歲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簡筌簧口述，田南萍、洪宜嬪記錄整理，〈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國史館館訊》，第3期，2009年12月。

### 四、期刊、報紙

《聯合報》，臺北，1960年。

《民主評論》，臺北，1952年。

《明報月刊》，香港，1969年。

《新新聞》周刊，臺北，1989年。

《讀賣新聞》，東京，1953年。

《自由中國》，臺北，1949-1960年。

《新聞天地》，上海、香港，1949、1960年。

### 五、專書

何卓恩《《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威權體制下的民主考驗》。臺北：水牛出版社，2008年。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 周策縱、唐德剛等作，《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教基金會，1991年。
- 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 李金銓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
- 馬之驢，《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
- 章 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陳漱渝、宋娜，《胡適與蔣介石》。武漢：武漢人民出版社，2011年。
- 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楊金榮，《角色與命運：晚年胡適的自由主義困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 鄒 儻，《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下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
- 臺灣教授協會編，《中華民國流亡臺灣60年暨戰後臺灣國際處境》。臺北：前衛出版社，2010年。

## 六、期刊論文

-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
- 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30期（2011年12月）。
- 何卓恩，〈思想與角色：胡適在《自由中國》的言論解讀〉，《安徽史學》，2009年第5期（2009年9月）。
- 李淑珍，〈自由主義、新儒家與一九五〇年代臺灣自由民主運動〉，《思與言》，第49卷2期（2011年6月）。
- 俞祖華、趙慧峰，〈從胡適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義的趨新與復古〉，《河北學刊》，2011年第9期（2011年9月）。
- 郭存孝，〈胡適與門人金承藝〉，《傳記文學》，第100卷3期（2012年3月）。



- 陳紅民、段智峰，〈相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2011年3月）。
- 陳儀深，〈一九五〇年代的胡適與蔣介石〉，《思與言》，第47卷2期（2009年6月）。
- 黃克武，〈1950年代胡適與蔣介石在思想上的一段交往〉，《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2011年12月）。
- 歐陽哲生，〈胡適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1997年5月）。

## 七、英文論著

- MacKinnon, Steven R. and Oris Friesen, eds.,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Press of California, 1987.
- Yang, Chen-te (楊貞德), “Hu Shih, Pragmat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Dissertation, 1993.

